

# 亞當·斯密思想解讀

Adam Smith

埃蒙·巴特勒 (Eamonn Butler) 著

趙根宗 譯

# 亞當·斯密思想解讀

Adam Smith



# 亞當·斯密思想解讀

## Adam Smith

埃蒙·巴特勒 (Eamonn Butler) 著

趙根宗 譯

商務印書館

*Adam Smith—a Primer*

First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July 2007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4 The Commercial Press(H.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亞當·斯密思想解讀

---

作 者：埃蒙·巴特勒 (Eamonn Butler)

譯 者：趙根宗

責任編輯：韓 佳

封面設計：楊啟業

出 版：商務印書館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 3 號東滙廣場 8 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印 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2014 商務印書館 (香港) 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6538 4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 目錄

作者簡介	<i>i</i>
序言	<i>iii</i>
致謝	<i>vii</i>
內容提要	<i>ix</i>
導論	<i>xi</i>
第一章 為甚麼亞當·斯密舉足輕重	1
舊的經濟學觀點	2
自由交換下的生產力	3
自由基礎之上的社會秩序	4
倫理學的心理學基礎	5
私利與美德	6
人性和人類社會	7
第二章 亞當·斯密的生活和職業	9
寇克卡迪和格拉斯哥	10
牛津大學和激勵措施	11
早期的講課生涯	12
旅行	14
《國富論》	15
海關專員	16

<b>第三章 《國富論》</b>	<b>17</b>
《國富論》豐富的思想內容	18
生產和交換	20
資本積累	34
經濟制度史	39
經濟理論和政策	40
政府的角色	46
今日的《國富論》	55
<b>第四章 《道德情操論》</b>	<b>51</b>
該書的主題	58
天生的同情是美德的基礎	59
獎勵、懲罰和社會	62
公正是基礎	64
自我批評和良心	65
道德規則	66
對財富的態度	67
自我改善	68
論美德	70
建設道德高尚的社會	71
<b>第五章 斯密的講義和其他著作</b>	<b>73</b>
統一的主題	74
斯密對科學哲學的評論	75
交流心理學	78
斯密關於政府和公共政策的論述	81
結論	85

第六章	關於“看不見的手”的題外話	87
	富人為窮人提供工作	88
	國內產業和國外產業	89
	人類行為無意間導致的後果	90
	自我延續的制度	91
	個人行為和社會後果	93
第七章	斯密名言選編	95
	延伸閱讀	105
	評論：亞當·斯密的現實意義	109





## 作者簡介

埃蒙·巴特勒 (Eamonn Butler) 博士是亞當·斯密研究所 (Adam Smith Institute) 總監。該研究所位於英國倫敦，是專門研究市場經濟政策的智庫機構。他擁有聖安德魯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經濟學及心理學碩士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

巴特勒博士最近的著作有《漫步自由市場》(*The Best Book on the Market*，2008年 Capstone 出版)、《佛利民思想解讀》(*Milton Friedman*，2011年 Harriman House 出版)、《亞當·斯密思想解讀》(*Adam Smith: A Primer*，2007年經濟事務研究所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出版) 及《英國衰敗狀況》(*Rotten State of Britain*，2009年 Gibson Square 出版)。

巴特勒博士早期的著作包括《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現代微觀經濟學革命的起源》(*Ludwig von Mises: Fountainhead Of The Modern Microeconomics Revolution*，1988年 Gower 出版) 和《四千年通脹史：工資和價格控制為甚麼會失敗》(*Forty Centuries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與羅伯特·L·許廷格 (Robert L. Schuettinger) 合著，1979年 Green Hill Publishers 出版)。巴特勒博士也曾

與梅森·皮里博士 (Dr. Madsen Pirie) 合著多本有關智商的普及書籍，由 Pan 出版社出版。自 1979 年起，他曾為亞當·斯密研究所編輯並與他人合著多本有關經濟及政策課題的出版物。

巴特勒博士定期在主要報章撰寫經濟學文章。他於 2012 年獲赫瑞瓦特大學 (Heriot-Watt University) 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Honorary D. Litt)。

## 序 言

我剛被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聘任為商業經濟學和商法教授（後簡稱為經濟科學教授），便於 1958 年受邀到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做講座。當時約翰·肯尼士·加爾布雷思（J. K. Galbraith）撰寫的《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剛剛出版不久，書中對亞當·斯密有一些讚美之詞。肯尼士·加爾布雷思那時很搶手，因此，當我在哈佛的一位朋友安排我與加爾布雷思見面共進午餐時，他認為是辦了一件“漂亮的事”。為了讓我放鬆些，他說，“阿倫，當上世界上最尊貴的經濟學教授，感覺如何啊？”我給搞糊塗了，便解釋說愛丁堡大學教授這一職位起初是在 1870 年由愛丁堡商人協會建立和資助的，因為顯然人們認為經濟學家可以預測商業周期。“但是，”肯尼士·加爾布雷思說道，“你可一定要當這個教授，這可是亞當·斯密曾經當過的。”“不好意思，”我回答說，“我跟他所在學校不同、專業不同、時代也不同。”（眾所周知，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先是當邏輯學教授，然後是道德哲學教授）午餐幾乎是不歡而散……

我對指出肯尼士·加爾布雷思的錯誤感到有些後悔，因為畢竟亞當·斯密跟愛丁堡頗有淵源，儘管他從未在愛

丁堡任教。他死後安葬在愛丁堡；並且，在墓地不遠處，我們很快就會看到蘇格蘭第一尊為紀念他而豎立的雕像。這得感謝亞當·斯密研究所所做的傑出努力，特別是埃蒙·巴特勒，也就是這本介紹斯密思想的書的作者——書寫得很精彩。而且，很多人都表示了解、欣賞斯密，並且作為蘇格蘭人，對他有種近乎於自家人的興趣，我和這些人一樣，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富論》這本書上。我完全沒有意識到，對斯密而言，他寫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MS*) 不僅是其道德觀念的基石，而且，日常人們在與他人相互交往時會如何表現以及應當如何表現，對此眾說紛紜，該書也是其分析各種論調的基礎。

巴特勒博士寫的斯密簡介，再輔以甘迺迪教授 (Professor Gavin Kennedy) 的權威介紹，即使不為別的，至少清楚地表明其實從來就沒有甚麼“亞當·斯密問題”，也就是使其道德哲學和經濟分析保持一致的問題。這打破了現在還盛行的迷思：即斯密是“資本主義” (斯密本人從未在任何地方用過該詞) 和投機活動的資產階級辯護者。這部分解釋了此書與眾不同的特徵之一：它非常重視對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有關人類行為的道德基礎的觀點進行解讀。這也是為甚麼巴特勒博士認為斯密根本上應當被看作社會心理學家的原因。

我已經充分表明，巴特勒博士寫的這本專著不僅僅是敘述人們所了解的斯密的生活和時代，而且其評註很新穎

獨特，這點專業人士也應仔細把玩。到此，我作序的任務就愉快地完成了，我可不想耽誤讀者像我一樣盡情享受此書的時間。

赫瑞瓦特大學 (Heriot-Watt University)  
愛丁堡商學院公共金融學名譽教授  
阿倫·皮科克 (Alan Peacock)

和所有經濟事務研究所出版物一樣，此論述表述的觀點均為作者個人意見，與經濟事務研究所（該所沒有集體意見）、該所管理託管人、學術顧問委員會成員或高級職員無關。

## 致 謝

感謝梅森•皮里博士（Dr. Madsen Pirie）和蓋文•甘迺迪教授（Prof. Gavin Kennedy）對此書提出的意見，感謝利斯•戴維斯（Lis Davies）對書中引用部分所提供的說明。





## 內容提要

- 一個國家的財富並不是重商主義者（mercantilists）所認為的那樣，是其國庫中金銀的數量，而是該國生產和商業貿易的總量，即我們今天所稱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 在自由交換中，交易雙方都受益。如果他們預計交易會吃虧，誰都不會進行交易。因此，正如出口對其他國家很重要一樣，進口對我們也同樣重要。我們致富並不是必須要使其他國家受窮才行。其實，如果我們的顧客富有，我們獲益會更多。

- 商業監管毫無道理，並且效果適得其反。賦稅、進口關稅、出口補貼以及對國內產業的優惠政策會威脅經濟繁榮。

- 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取決於勞動分工以及資本積累，並且有積累才可能有分工。把生產分解為很多小步驟，每個步驟都由專業人員負責，產出就會大幅增加，從而使生產者有剩餘進行投資。

- 一個國家的未來收入取決於資本積累率。在更先進的生產工藝上投入越多，未來生產的財富就越多。

- 在自由貿易和競爭情況下，市場會自動調節，始終

把重點放在最迫切的需求上。如果商品稀缺，人們就願意多花錢來買。於是，提供這些商品就會有更多的利潤，結果，生產商就會投資生產更多商品。

- 如果有公開、競爭性的市場，人們可以自由交易，沒有強買強賣，那麼，財富增長就最快。必須有國防、正義和法治來維護市場的公開性。自由和自利並不會導致混亂，而是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引似的，走向秩序和和諧。

- 既得利益者會利用政府權力扭曲市場制度，牟取私利。僱主和從業者可能會推動出台打壓競爭的種種規章，如阻止人們從事特定行業的進入壁壘等。

- 稅應當按收入依比例徵收，並應當定明數額，方便繳納。徵稅成本要低廉；稅收不能妨礙經營，也不應太過繁重以誘發逃稅。並且不能規定收稅人員須頻繁來訪查稅。

- 人類都有“同情”（確切地說應為情感共鳴）他人的天性。它會使人們節制自己的行為並保持和諧。它也是人們對行為進行道德判斷的基礎，以及人類美德的泉源。人性比激進分子和空想家過於自負的理性能更好地為建立和諧的社會提供指導。

## 導 論

蓋文·甘迺迪 (Gavin Kennedy)<sup>1</sup>

埃蒙·巴特勒撰寫的亞當·斯密簡介一書介紹了斯密的生平和思想，該書精彩又富有權威性，在我了解之中，它在已出版的介紹斯密的小冊子中是最好的。任何人讀完後都會了解斯密研究的真意。

埃蒙·巴特勒完全避開了圍繞斯密的政治經濟學引起的眾多紛爭，多年來，已經出現了很多關於這方面的著述。斯密以獨特視角對直到十八世紀後半葉的英國社會的演化進行了綜合分析，而巴特勒在本書中通過講述斯密其人及其著作，又對這一分析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

亞當·斯密先出版的是《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這本不太為人所知的書，17年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下稱《國富論》) 一書才出版。人們根據這一時間間隔斷言斯密改變了主張，認為激勵人們行動的因素不再是具有道德價值的善行，而是沒有是非區分的私利。不過，從其姓名不詳的學

---

1 蓋文·甘迺迪 (Gavin Kennedy) 是赫瑞瓦特大學 (Heriot-Watt University) 榮譽退休教授，著有 *Adam Smith's Lost Legacy* 一書，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公司於 2005 年出版。

生們在 1762 到 1763 年間記下的斯密講課筆記中，我們了解到斯密講義中大部分內容幾乎一字不差地重新出现在了 1776 年出版的《國富論》中。他把倫理學講義（1751-1762）整理成《道德情操論》於 1759 年出版。因此，亞當·斯密在人類行為動機問題上並沒有自相矛盾。

斯密是道德哲學家。在十八世紀，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學科，直到十九世紀晚期它才獨立出來。誠然，斯密之前以及他同時代的許多人都寫過論述經濟問題的小冊子（耶魯大學存有數千份十六到十八世紀期間這樣的小冊子），並且有些作者對經濟學也有所貢獻，但就研究綜合性的廣度與深度來說，無人能出其右。

斯密之前的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如何通過積累金塊和銀塊使君主和國家富有，為對外戰爭提供資金。《國富論》則把政治經濟學的重點重新放到通過“土地和勞動每年的產出”使消費者富有起來。《國富論》不是教科書，它專門探討財富的性質以及財富增長的原因。

《國富論》第一卷和第二卷講述人類社會的獨有特徵，例如人類交換的天性、勞動分工、生產要素、市場活力以及所有參與者之間的收入分配。第三卷把十八世紀英國納入到社會演化的背景中，描述了從原始的狩獵社會，經“畜牧”和“農業”社會，進化到商業時代，並表明五世紀羅馬的崩潰打斷了西歐這種“自然”發展的進程。

十五世紀後歐洲開始復甦，但其復甦卻受累於種

種政策，因為這些政策是為斯密所稱的“重商主義”（mercantile commerce）服務的。在《國富論》第四卷中斯密嚴厲批評了重商主義的主要錯誤。該理論認為國家的財富在於積累金塊和銀塊；貿易平衡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一個國家必須出口多於進口。更糟糕的是，該觀點認為，如果有保護性壟斷，對勞動力僱用和流動進行限制，並對自然的市場自由進行干預，那麼國內經濟就會更加強大。

斯密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主要是解除對市場的干預，因為它改變了市場的自然運行機制。他力主允許人們把“土地、勞動力或資本”與其他要素結合起來，生產產品在市場上出售，從而擴大以競爭方式生產的產品的自由交換，使經濟自然增長。在支付地主地租、工人工資以及商人和生產者利潤後，資本擁有者會把其淨利潤重新投資到生產活動中，通過不斷的生產和交換，創造出真正的財富，因為它來自整個社會每年的勞動和土地產出。並且通過“流通之巨輪”不斷的循環，這種財富會繼續逐步緩慢增長。

在第五卷中，斯密論述了政府應當扮演的角色，詳述了其基本職能：國防、司法、促進商業的公共工程和機構、對“各個年齡層的人”的教育、應對“令人生厭的疾病”的措施、維護“君主尊嚴”、以及通過向受益人收稅和收費為這些開支提供資金（而不是通過發行公債）。

《國富論》論述了斯密時代特別具有破壞力的重商主義

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演化過程：從羅馬帝國崩潰，到歐洲復甦，以及隨後 1,000 年間君主和封建制度下的民族國家出現。過去的 200 年間有很多人對斯密的著作進行批評，儘管他們條件有利——又做了 200 年的研究，但是，卻駁不倒斯密。

西歐大多數人非常貧困。他們主要因為赤貧和受迫害才移民北美、南非和澳大拉西亞的，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早期。斯密透過貧窮現象看到了其原因，也就是沒有創造財富。脫貧的辦法只能來自社會內部，即創造生產財富的條件。正是針對這一問題上，他將自己的歷史方法應用到了研究人類社會上。斯密通曉希臘和拉丁語經典著作，他在書中常常引用其中的例子和引言。和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中所有重要人物一樣，他是向後追溯社會的起源，而不是向前展望各種烏托邦社會。這種烏托邦式的浪漫主義在十九世紀蓬勃發展，而不是在十八世紀。

歐洲文明墮入暴君統治的野蠻狀態和封建社會，但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斯密書中常用的片語）農業生產恢復了，人口增長了，商業交易也在一些零散的集市和市場重新開始了。1760 年之前的 100 年間，在家庭日用品方面，即使是在最窮的普通工人家庭中，相對而言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富足”（很大程度上受益於二手交易），這比北美狩獵部落以及他們最有權勢的“酋長”都富足。來自旅行者的傳聞，再結合對寇克卡迪（Kirk caldy）附近小的釘針廠和

鐵匠舖的觀察，斯密發現真正財富的創造並不是生產金塊和銀塊，而是生產和分配那些粗糙的土地及社會勞動的產出。這些產品開始在勞動者的家裏出現，這才是一個國家相對富足程度的真正的晴雨表。

斯密最初的洞見並不是發現了勞動分工，這一“榮譽”最早歸於柏拉圖，而“現代”則歸於威廉·佩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 1690）。斯密的貢獻是認識到勞動分工的重要意義，通過勞動分工，真正的富足可以普及到人口中的大多數，而不是僅僅惠及最富有的人。這樣，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後，使所有人都逐步更加富裕。

這使他發問：如果勞動分工是致富關鍵，那麼，在甚麼條件下才會增加產出？每個人的分配份額如何確定？有甚麼障礙阻礙這一過程？最後一個問題很關鍵。斯密實現了從描述問題到分析問題的飛躍，他也因此邁出了通向經濟學這門新科學基礎的第一步。

我下面簡單總結一下斯密提出的完全自由條件下的商業經濟模式，作為後面巴特勒所寫的精彩介紹的補充。

在商品社會中，通過勞動分工生產出的適銷產品得以交換。物物交換，即直接但低效的以物換物，其出現比通過錢幣進行的更為高效的間接交換要早很多。幾千年前古代文明社會中就出現了錢幣，這表明由於勞動分工，商業就出現了（否則他們要錢幣幹甚麼呢？）。

最早的交換是農村產品（糧食和原材料）和小城鎮產品



(原始的手工加工工具和小飾品等)間的交換。交換商品的市場價格是由供給和有效需求決定的，可能和斯密所稱的“自然價格”不同。對後者而言，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擁有者在生產中互相合作的收益與其成本完全一致，其中包括當地的自然利潤率。而市場價格總是圍繞均衡點波動，但從不會固定在該點上，因此可能連成本都賺不回來。然而，變化的市場價格會向市場參與者發出買或賣到產品要支付更多或更少的訊號，以及要供應更多或更少該產品的訊號。隨着時間推移，實際供給必定依據這些訊號進行調整。這些構成了競爭性經濟的動態過程。

勞動要麼是生產性的，要麼是非生產性的。兩者的區別在於勞動與固定資本聯手生產的商品是否在市場上出售，並能賺回成本，包括該經營過程的利潤。而那些非生產性勞動產品(如做家務的僕人為富人準備晚餐)，並不在市場上出售以換回成本，它是對收入的消耗。生產性勞動的產品則能掙回成本，並產生淨收益(利潤)，可用以消費(奢侈)，或淨投資(節儉)。一個國家之所以變得更富有是因為在一段時間內該國節儉的生產者比例比奢侈的生產者的比例來得高。一個國家每年都有淨投資率，則會增加就業(從而提高勞動工資並把財富普及到最窮的大多數人)，從而增加“生活必需品、便利品以及娛樂產品”的年產出。

不幸的是，羅馬帝國的崩潰打斷了這一自然進程。等到1,000年以後，經濟復甦，農業技術上的進步，以及科

學復興所帶來的新的技術潛力都得到了利用。此時，社會已經產生了各種政治制度，包括宗教教義，這些制度將錯誤的重商主義觀點立為法律，從而阻止了經濟的自然發展。

法令強徵關稅和稅收並且禁止自由貿易，另外城鎮同行會和手工業壟斷也減少了競爭市場自由進出的好處，從而使完全自由需要做出妥協。同時，還因為工人沒有做長期的學徒工而剝奪其從事該行業工作的自然權利，並阻止人們買賣非當地生產的產品。為了追求重商主義者貿易平衡的幻象，強徵進口關稅，對出口給予退稅和補貼，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令人不安的是，亞當·斯密所關注的問題，即對保持正的淨投資率所採取的種種限制政策，在二十一世紀依然困擾着我們，並且同樣是由持重商主義思維的立法機構和大眾的錯誤觀念所推動。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發達國家的絕對貧困問題已不再像斯密時期那樣，但是，世界上發展中國家和非發展中國家的絕對和相對貧困問題，應當能打動所有經濟學家的心扉，正如其曾打動亞當·斯密並促其思考一樣。而回頭看的話，亞當·斯密其實是首位經濟學家。

據說現在的讀者覺得《國富論》“很難”並且“不重要”，因為書中有很多所謂的離題的內容和詳細論述。其實所有這些幾乎都是因為沒有理解斯密所講內容造成的。他不是現代派“經濟學原理”教科書式的作者，斯密在世時，這一學科還沒建立。他研究的是國民財富的真正意義、財富增

長和社會走向富裕的原因以及障礙。他把自己這些研究寫成了報告。斯密的著述恰到好處，恰逢其時，展現了其天才，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看過埃蒙·巴特勒寫的這一讀本，讀者就會明白這個道理。所以，這本小書就是您的最佳選擇。

## 第一章

# 為甚麼亞當·斯密舉足輕重

---

亞當·斯密（1723-1790）是蘇格蘭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他寫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一書（即《國富論》）是歷來最具影響力的書目之一，他也因此而廣為人知。斯密把我們對經濟生活準則的看法從古代引領到現代，所有這一切都根植於其對人類社會生活方式的全新解讀。

---

## 舊的經濟學觀點

的確，亞當·斯密大大地改變了我們的觀念，因此，現在即使想要描述他那個時代盛行的經濟制度都是很困難的。那時的經濟制度被稱作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它根據一個國家金銀儲量來衡量其財富。人們認為從國外進口貨物有害無益，因為這意味着必須交出這種所謂的國家財富用來支付；而出口貨物則被認為有利，因為這樣就可以換回寶貴的金銀。貿易只對賣方有利，而對買方則不然。一個國家要想更加富有，必須使其他國家更加貧窮才行。

按照這種觀點，人們建立了龐大的管控體系，比如，進口稅、出口商補貼以及對國內工業的保護等，目的就是阻止本國財富的外流。這種體制甚至讓英國自己在美洲的殖民地也深受其害，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的確，所有的商業活動都受到懷疑，國內經濟也被貿易保

護主義文化說籠罩。許多城市阻止其他地方的手藝人來到自己的地區從事其所在的行業，工廠主和商人請求國王給予其保護性壟斷地位；節省勞力的設備如新織襪機被禁止使用，因為它對現有的生產者構成了威脅。

## 自由交換下的生產力

亞當·斯密證明這種龐大的重商主義管控體制其基礎錯誤，並且結果事與願違。他爭辯說在自由交換條件下，交易雙方的境況都變得更好了。原因很簡單：如果人們預計交易會吃虧，那就不會有人願意進行交易了。正如賣方受益一樣，買方也受會益。正如我們的出口對其他國家很重要一樣，進口對我們也同樣重要。我們致富並不是必須要使其他國家受窮才行。其實，如果我們的顧客很富有，我們獲益會更多。<sup>1</sup>

自由交換使雙方都受益已經成為基本常識，據此亞當·斯密認為貿易和交換肯定會增加我們的財富，正如農業和製造業毫無疑問讓我們富有一樣。國家的財富不是國庫中的金銀數量，而是其生產和商業的總量，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國內生產總值。

---

1 《國富論》第四卷第三章第二小節，第 493 頁第 c9 段（註釋中的相關頁碼均參考格拉斯哥版亞當·斯密著作和通訊集英文版。詳見延伸閱讀）

這在當時是個新思想，但是影響卻很大。它把十六世紀以來歐洲各國建立起來的貿易壁壘在理論上衝開了一個大的缺口，而且實踐中也卓有成效。《國富論》寫作風格直截了當、尖銳辛辣、嚴謹，語帶譏刺，實例豐富，因此，從事生產和貿易的人也都能看懂，並把這些思想變成了行動。

該書出版遲了一步，沒能阻止英國與其美洲殖民地的戰爭。但它為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宣導自由貿易和簡化稅收以及後來羅伯特·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採取措施放開農產品市場打下了基礎。因此，該書堪稱十九世紀時期自由貿易和經濟發展的基礎。即使到今天自由貿易這一常識依然被全世界所認可，儘管實現它有很多實際困難。

## 自由基礎之上的社會秩序

亞當·斯密無法預計這種影響，但是，他對個人自由和商業自由卻越來越有信心，而這又直接來源於他對人類社會實際生活方式徹底的、全新的洞察。他認識到當人們努力找到與其他人共同生活和工作的方法時，人類社會自然而然就和諧了。自由和私利並非一定會引起混亂，恰恰相反，它們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引似的，會製造出秩序和和諧。

它還會使資源得到最高效的利用。當自由的人們與其他入達成交易時——當然，其目的只是使自己的境況更好，國家的土地、資本、技能、知識、時間、創業精神以及創新就會必然自動地被吸引到人們最看重的目標上來。

因此，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並不需要國王及大臣進行持續不斷的監督。作為人性的產物，它自然而然就發展起來。但是，要發展得最好，運行得最高效，則必須有公開、競爭的市場，可以自由交換並且沒有強買強賣。當然，要保持其公開性，必須有規則。正如要用火盆來放置爐火一樣。但這些準則，這些有關正義和道德的準則是普適和客觀的，與重商主義政府具體和主觀化的干預截然不同。

因此，《國富論》並不像我們今天理解的那樣，僅僅研究經濟學，其實，它是一部開創性的研究人類生活、福利、政治制度、法律和道德的社會心理學專著。

## 倫理學的心理學基礎

亞當·斯密所處的年代，知識份子有可能對諸如科學、藝術、文學、哲學、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以及倫理學等無所不通。他就是這樣的人。他收集了大量的藏書，並計劃寫一部人文科學的書以及一部有關法律和政治學



的書。其實最早讓他出名的並不是《國富論》，而是一部倫理學書——《道德情操論》。這本書現在不太有名，但當時其影響力絲毫不亞於《國富論》，對亞當·斯密的重要程度也可比肩《國富論》。

《道德情操論》試圖辨明我們形成道德判斷的基礎。這裏亞當·斯密又一次認為這屬於深層次的人類心理問題。人天性有“同情心”（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感情共鳴”），從而使人們可以明白該如何約束自己的行為並維持和諧。這是人們對行為進行道德評判的基礎，也是人類美德的根源。

## 私利與美德

今天有些人不明白推動亞當·斯密筆下的經濟制度的私利如何能與構成其倫理學基礎的“同情心”並行不悖。以下就是他的回答：“不論假定人多麼自私，顯然，人性中存在某些準則使其關注他人的命運，並使其認識到他人的幸福對自己而言不可或缺，儘管他這樣做除了見證別人的幸福而感到快樂外一無所獲。”<sup>2</sup>

換句話說，人性是複雜的。麵包師並非出於善心才向我們供應麵包；但是，同樣的道理，人們也並非出於

---

2 《道德情操論》第一卷第一章第9頁第1段。

私利才跳入河中去救溺水的陌生人。亞當·斯密的兩部書相輔相成，都試圖說明自私的人類如何可以而且確實能夠高效地（在經濟方面）、和平地（在道德領域）生活在一起。

但是，話又說回來，《國富論》並不像有時人們諷刺的那樣擁護殘酷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恰恰相反，它對此絕不認同。私利可能會推動經濟，但是如果有真正公開的競爭並且沒有強買強賣，那私利就是行善的力量。不論怎樣，書的每一頁都體現了亞當·斯密自己的人文主義情懷。他把國家福利，特別是窮人的福利，提高到比商人和有權勢的人的特殊利益更高的地位，抨擊那些試圖破壞自由競爭的生產商，並譴責那些幫助生產商的政府。

## 人性和人類社會

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們逐漸意識到人類社會的基礎一定比教士傳下來的教義或者政治權威發佈的命令更為牢固。有些思想家努力去發現“理性”的法律和倫理制度，但是亞當·斯密卻表明人類社會——包括科學、語言、藝術以及商業——都深深扎根於人性基礎之上。他證明我們的本性比任何過於傲慢的理性都能更好地指導我

們。如果我們簡單地廢除“所有的優惠或限制制度”，<sup>3</sup> 而依靠“天賦自由”，無意之中我們就一定會步入和諧、和平和高效的社會制度。

這種開明的社會制度並不需要國王和大臣們不斷地呵護來維持。但是它的確要靠人們遵守一些人際交往規則：如正義以及尊重他人的生命和財產。這樣，良好的整體社會制度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亞當·斯密的研究就是找出產生這種幸運結果的人類行為的天賦原則。

---

3 《國富論》第四卷第九章第 687 頁第 51 段。

## 第二章

# 亞當·斯密的**生活**和**職業**

---

瑪格麗特·道格拉斯 (Margaret Douglas) 的丈夫是一位律師，以前做過海關官員，人脈很廣。他於 1723 年 1 月去世，那時，瑪格麗特已有身孕。在當年的 6 月 5 號，她為孩子辦理了出生登記，並給他起了自己去世的丈夫的名字：亞當·斯密。這個男孩長大後成為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寫的書也是歷來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

---

## 寇克卡迪和格拉斯哥

關於斯密的童年，我們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在 3 歲的時候曾被一羣吉普賽人拐走一小段時間，後來被他叔叔救回。但家鄉的日常生活肯定為斯密提供了大量素材，並融入到他以後的職業生涯中。蘇格蘭的寇克卡迪港位於愛丁堡的福斯灣 (Firth of Forth)，是個貿易中心，那裏有很多船，有的打魚，有的從當地煤礦運煤外銷，然後再運回當地鐵加工業所需要的廢鐵。<sup>1</sup> 亞當·斯密就在當地的水手、魚商、製釘匠、海關官員和走私者中間長大，他以後會在《國富論》中描繪這些人的營生。

但是，情況在變。與美洲的商品貿易如棉花和煙葉

---

1 E. G. West, *Adam Smith: The Man and His Works*, Liberty Fund, Indianapolis, IN, 1976, p.31.

與日俱增，相比東部陳舊的寇克卡迪港，西部現代化港口如格拉斯哥（Glasgow）更受青睞。<sup>2</sup> 亞當・斯密的巨著也會記錄這些貿易格局的轉變，以及那些靠貿易生活的人們的生活方式的轉變。

上學時，斯密癡迷讀書、記憶力超人的特點就很突出。在 14 歲時他升入格拉斯哥大學（這在當時是正常上大學的年齡）。他師從偉大的道德哲學家法蘭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他是自由意志論者、理性主義者、功利主義者，因直言不諱成為政府的眼中釘。他似乎把某些同樣的特徵帶給了斯密。

## 牛津大學和激勵措施

斯密學習出類拔萃，獲得了到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學習的獎學金。1740 年，他那時剛 17 歲，便準備好騎馬走一個月到牛津大學。商業城市格拉斯哥興旺時，曾讓這個來自寇克卡迪這樣落後地區的男孩大開眼界，但英格蘭似乎是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斯密描述了英格蘭宏偉的建築，肥壯的牛羣，這種牛和斯密家鄉蘇格蘭的瘦型牛全然不同。

但英格蘭的教育制度並沒有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不

---

2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Adam Smith*, Croome Helm, London, 1982, pp.9-10.

過在不當激勵的作用方面，倒的確給他上了重要的一課。對此，他在《國富論》中不無譏刺地進行了詳細講述。牛津大學教師的工資是從學院獲得的大量捐贈支付的，而不是來自學生的學費。結果，在牛津大學，“大部分大學教授這些年來完全放棄了教書，甚至連裝裝樣子教書都懶得去做”。<sup>3</sup> 大學生活被搞成是“為了老師的利益，或者更確切地說，為了他們的安逸。”<sup>4</sup> 斯密的經濟學學得很快。

貝利奧爾學院擁有世界一流的圖書館，因此，斯密可以自學古希臘語和拉丁語、文學及其他專業。他於1746年在其獎學金資格到期前就離開了牛津大學，回到了寇克卡迪。在這裏他花了兩年時間從事文學、物理、邏輯學和科學方法的寫作。

## 早期的講課生涯

卡姆斯勳爵（Lord Kames）是著名律師和思想家，他通過家人的朋友邀請斯密到愛丁堡就英國文學和法律哲學做系列公開講座。從他的講稿中，我們可以看出甚至在他二十多歲時，斯密就已經在研究很多關鍵想法（如勞動分工），很久以後，這些內容成了《國富論》一書的

3 《國富論》第五卷第一章第三小節第二部分，第761頁第f8段。

4 同上，第五卷第一章第三小節第二部分，第764頁第f15段。

重要基礎。

他做的講座大獲成功，這也成了他轉到下個職業的跳板。1751年，在他27歲時，斯密又回到了格拉斯哥大學，不過這次是來教授邏輯學、道德哲學以及修辭學的。（當時“修辭學”根本沒有今天的含義，只是研究風格和交流。）

他開的哲學課包括神學、倫理學、法理學以及公共政策。法理學和公共政策講稿（僅存於其學生所做的筆記）中包括很多思想（如價格體系運行機制、貿易保護主義的弊端以及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發展），這些內容多年後幾乎一字不動地出現在了《國富論》中。

但是，讓他發財的卻是其對倫理學的思考。1759年，他把自己的思考整理寫成了《道德情操論》發表。該書風格高雅，匠心獨運，從人類社會心理學角度解釋了我們的道德評價問題。斯密的朋友，哲學家 and 歷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把這本書送給了很多朋友，其中一個是政治家查理斯·湯孫德（Charles Townshend），他看後大為欣賞，馬上就以每年300英鎊的高薪聘請斯密做其繼子——年輕的巴克盧公爵（Duke of Buccleuch）的終身家庭教師。



## 旅行

斯密儘管智力超羣，但選他做家庭教師卻有些怪。作家詹姆士·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說他“滿腦子都是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使他心不在焉。這一點是眾所周知的。有一回，他想問題想得出神，把麵包和乳酪當作茶來沖泡。還有一次，在沉思某個問題時，他一直步行八英里到了鄧弗姆林（Dunfermline），這時才意識到自己在甚麼地方；還有，他因為沒有留意前面的路而掉進了溝裏。

但是沒多久，斯密就和自己的學生一起出發前往法國了。那時貴族青年都要旅行，這是教育的一部分。在巴黎，他們很喜歡和熱情洋溢的大衛·休謨相處。休謨是英國駐法國大使的私人秘書。但是，斯密的法語口語很差，他感到很難結識他人。他開始感到很無聊，並告訴休謨說“我已經開始寫本書來消磨時間。”<sup>5</sup> 他說的這本書就是《國富論》。

在後來的旅行中，他先是穿過法國南部到達日內瓦，再返回巴黎。期間，斯密了解到了歐洲各地有關文化、政府、商業、監管以及經濟生活的種種現象，並對與國內的區別之處進行思考。他還與歐洲大陸重要的思

---

5 Letter to David Hume dated 5 July 1764.

想家進行了討論，這進一步深化了他撰寫自己的巨著時所作的思考。

## 《國富論》

他們師生兩人於 1766 年返回倫敦。斯密又返回到寇克卡迪定居下來。他現在有錢能在那裏的商業大街 (High Street) 買個寬大結實的房子，和母親及表姐珍妮特住在一起。(斯密一直與母親相依為命，直到她於 1784 年去世。他從未結婚，不過，很顯然，他早年曾迷戀“一位才貌俱佳的年輕女士”。<sup>6</sup>)

他在寇克卡迪呆了很多年，撰寫、修改並潤色其手稿，這對他的健康有些傷害。但他從 1773 年到 1776 年一直住在倫敦，時間很長，身體得到了恢復。這期間，他與很多大師相交甚歡，包括畫家約書亞雷諾茲爵士 (Sir Joshua Reynolds)、古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 (Edward Gibbon)、激進政治家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以及包斯威爾 (Boswell)，甚至還有詞典編纂家塞繆爾·詹森博士 (Dr. Samuel Johnson) (儘管他們觀點不同)。

1776 年 3 月《國富論》終於出版了。該書非常暢銷，

---

6 D. Stewart,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 LL.D.', 1794, in *The Glasgow Edition*, vol. III, note K, pp.349-50.

僅僅幾年內便多次再版，並被譯成多種語言。它在實踐上也很成功：書中的對策如自由化等開始慢慢進入公共政策中。

## 海關專員

斯密被封為愛丁堡海關專員，年薪高達 600 英鎊。斯密是英國武斷而又低效的海關制度的主要批評者，現在他有條件對其改革了，並且他很敬業。<sup>7</sup>他在其他問題上也建言獻策，比如反對對愛爾蘭進行貿易限制，並對美洲殖民地的“亂子”提出建議等。後來首相威廉·皮特採納了斯密的原則，與法國簽訂了貿易協定，並對英國的稅制進行了廣泛的改革。

斯密喜歡與朋友們進行討論和辯論。1790 年 7 月，他在愛丁堡像往常一樣晚上與朋友辯論時，感到很累便上牀休息了，還說這次討論還得再找個地方繼續。可是，幾天後他就去世了，並被安葬在家鄉坎農格特（Canongate）附近的墓地，其墓碑很大但又很樸素。

---

7 Campbell and Skinner, *Adam Smith*, pp. 200-203.

第三章

《國富論》

## 《國富論》豐富的思想內容

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其部分目的就是促使政治家們放棄他們制定的政策，因為這些政策限制和扭曲商業，而不是使其興旺發達。因此，他用語樸實，現在還很容易看懂。

但斯密也在努力打造一門新的經濟科學。這是開創性的工作，因此他使用的專業詞彙和概念可能很難與現在的完全一致。他行文發散，插話很長很多，事實很多，從中國銀子的價格到倫敦的愛爾蘭妓女的飲食等。所有這些都使這本書很難導讀。因此，讓我們先關注其主要主題思想。

最明顯的主題思想是**商業監管毫無道理，並且效果適得其反**。當時的流行觀點是“重商主義”觀念，即國家的財富就是其擁有的錢的數量。這意味着國家要想更加富有，就得儘量多賣商品給其他國家，這樣才能換回儘可能多的金幣。同時它得儘可能少買其他國家的產品，以防止本國的現金儲備流失到國外。這種貿易觀念導致進口稅、出口補貼、國內工業減稅和優惠等龐大制度的產生，設計所有這些都是為了限制進口和促進出口。

斯密的顛覆性觀點認為財富並不是指國庫中儲藏的金銀數量。**國家財富的真正衡量標準是其不斷生產的產品和服務**。他創造了國內生產總值這一當代經濟學最普

通而又根本的概念。<sup>8</sup> 而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最大化，他爭辯說，並不是要限制國家的生產能力，而是要解放它。

另外一個中心思想是**生產能力取決於勞動分工以及資本積累**，並且有積累才可能有分工。把生產過程分成很多小步驟，每步都由專業人員來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效率。這樣生產者就有了剩餘產品，可以拿來與他人交換，或用來投資購買新的更為高效的節省勞力的機器設備。

斯密的第三個主題思想是一個**國家的未來收入取決於其資本積累**。在更好的生產工藝方面投資越多，未來創造的財富就越多。但是，如果人們想要積累資本，他們必須確信自己的資本很安全，不會被竊取。因此，國家要繁榮，必須積累資本，並且加以妥善管理和保護。

第四個主題是**這個體系是自動調節的**。商品稀缺，人們就願意多花錢來買，產品供應者就有更多的利潤，因此生產者就會投入更多的資本以生產更多的產品。如果商品過剩，價格和利潤就低，生產者就會把資本和經營轉向別處。這樣產業就一直集中在國家最重要的需求上，並不需要中央政府的指導。

但是，**該體系只有在自由貿易和競爭條件下才能實現自動調節**。如果政府偏袒生產者，給其發放補貼或授

---

8 P. J. O'Rourke 在 *On Wealth of Nations*, Atlantic Monthly Press, New York, 2006, pp. 7-8 中的精闢論述。

權壟斷，或設置關稅壁壘對其加以保護，那麼，生產者售價就會更高。這對窮人損害最大，因為他們要面臨更高的價格來購買賴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

《國富論》的另外一個主題是**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是如何產生不同的政治制度的**。早期的狩獵者和拾荒者沒有多少財富。但是，在人們成為農民後，土地、莊稼和牲畜就是他們的重要財產。於是他們就建立了政府和法律制度保護財產。

在商品時代，當人們積累資本後，財產就變得越發重要了。但這個時代為商人所充斥，他們操縱市場以牟取暴利，而且他們很狡猾地利用政治手段來幫助他們。**生產者可以從政府機構中獲取壟斷地位、稅收優惠、管制以及其他特權，從而威脅競爭和自由貿易。**

由於以上原因，斯密推崇**有限的政府**。政府有其核心功能如維護國防、維持秩序、建設基礎設施以及推動教育等。政府還應保持市場經濟的公平和自由，而不應實施扭曲市場的行為。

## 生產和交換

《國富論》共五卷，第一卷闡述了生產和交換原理，以及其對國家收入的貢獻。

## 專業化的好處

利用製針廠這一實例，斯密證明**勞動分工**——勞動專業化，可以大幅提高產量。製造針好像是個“微不足道的活兒”，但其實卻很複雜。鐵絲要抽出、拉直、剪斷和削尖。頂部要磨平以便裝針頭，而針頭也要製作好後安裝上去。針必須拋光增亮並放入紙包內。的確，整個過程大概有 18 個不同的工序。

斯密說，單獨一個人如果要做所有這些工序，一天內很可能不會製造出 20 枚針（如果還要採礦，並把需要的金屬冶煉，也許一年也生產不了一枚針）。但工廠把這一工作分給了不同的人，每個人只做一兩個單獨的工序。他們一起合作，10 人組成的製針團隊一天可以製成 48,000 枚針。相當於每人生產 4,800 枚，或者說是一個人單幹一天產量的 240 倍。

專業化的效率非常高，不僅公司內部實行，連各個不同的行業、甚至國家之間也有分工。農民專門種莊稼或養牲畜，不必花時間生產所有家用產品，因此他們土地就料理得更好，也更高產。另一方面，手工業者很高興為農民提供家用產品，而讓農民為自己生產糧食。同樣地，國家之間也有分工，每個國家出口的都是各自最擅長生產的商品，進口的則是其他國家更擅長生產的商品。

斯密指出，人們多次重複同樣的工作就會熟練，但效率提高並不僅僅因為熟練的技巧，還因為從一個環節



轉到下一個環節用時縮短了，並且專業化使人們可以利用節省人力的專用機器來進一步提高產量。結果：“勞動者生產能力的最大幅度提升，不論在任何領域或從事任何工作，他們所展現的技能、熟練程度、以及判斷力，很大程度上似乎都是勞動分工的作用。”<sup>9</sup>

勞動分工利用數以千計的工人合作來生產甚至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產品：

例如，零工穿的羊毛大衣，儘管看上去可能粗糙簡陋，但它卻是很多工人共同勞動的產品。牧羊人、羊毛分揀者、羊毛梳理者、染色者、粗梳者、紡紗工、織布工、蒸洗者、整布者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必須把各自不同的工作結合起來，才能完成甚至是這樣一件簡陋的產品。<sup>10</sup>

另外，運輸羊毛還需要水手、造船者和船帆生產者；甚至剪羊毛的剪刀也需要有礦工和鐵匠。這份名單看來無窮無盡。但是，數以千計非常高效的專業人員的合作是發達國家巨額財富的來源，這種合作使像羊毛大衣這類商品就連最窮的人都能買得起——這就是斯密所

---

9 《國富論》第一卷第一章第 13 頁第 1 段。

10 同上，第一卷第一章第 22 頁第 11 段。

稱的“擴大到社會最底層人羣的普遍富裕。”<sup>11</sup>

### 交換對雙方的好處

斯密在關鍵的第二章中闡述了**商品交換**是如何把生產效率帶來的收益擴散到社會全體的。他猜測，在“原始社會”，由於某種特別的腦力或體力天賦，某個人可能比其他人更擅長造箭，而另外一個則更擅長打鐵。通過專業化分工，造箭的人生產了很多箭，鐵匠打造了很多刀，自己一個人不可能用完。因此他們就拿箭來換刀。結果，兩人都既有箭又有刀。每個人都從對方高效而專業的生產中受益了。

斯密聲稱人們“交換”的傾向是人類行為普遍的天性。這正是因為交易雙方都受益。的確，如果任何一方認為交換讓自己吃虧的話，交換根本不可能發生。這一深刻見解非常重要。斯密所處的世界，和我們現在的世界一樣，大多數商品交易都是換取金錢，而不是換取其他商品。因此，錢被認為是財富。看上去好像只有賣主可以從交易中受益。但是，斯密卻表明交易使雙方都受益。通過交換，雙方都買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所花的代價比自己生產這些商品要小。因此，交易使雙方都更加富有。財富，換句話說，並不是固定不變的，

---

11 《國富論》第一卷第一章第 22 頁第 10 段。

而是由人們的商業往來創造的。這是開創性的思想。

另外一條深刻見解也很關鍵。斯密認為，儘管交易各方提出並接受交易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私利，並沒有考慮對方的利益，但交易仍然使雙方受益。這很幸運，因為它讓我們有辦法說服其他人賣出我們想要的東西。斯密有如下的名言：

我們有飯吃，靠的並不是肉商、酒商或麵包師的仁慈，而是靠他們對自己利益的關心。我們倚重的是他們的自利心態，而不是他們的人道精神。只要向他們買必需品，我們就會講到他們從中得到的利益。<sup>12</sup>

斯密所稱的“自愛”或“私利”並不是今天意義上的“貪婪”或“自私”，他講的是這兩個詞在十八世紀的意義：不是某種令人不快的損人利己的願望，而只是對自己利益完全正當合理的關心。這對人類而言很自然也很重要，因此他在《道德情操論》中稱之為“審慎”（prudence），<sup>13</sup> 在該書中，他強調對他人的“同情”（就是我們所稱的“感情共鳴”）是人性的顯著特徵，正義（不傷害他人）則是其根本規則之一。

---

12 《國富論》第一卷第二章第 26-7 頁第 12 段

13 《道德情操論》第一卷第一篇。

## 市場越大，收益也越大

交易使我們受益，推動我們走向專業化，從而增加剩餘產品，就可以和他人交換。斯密指出，專業化程度如何則取決於可以交易的範圍大小，換句話說，取決於市場的大小。<sup>14</sup> 例如，只有“大城市”才能給搬運工提供足夠多的顧客；而分散的社區可能無法養活甚至是專門的木匠或石匠，逼得人們親手做更多這方面的工作。

確實能夠擴大市場的一個因素是**金錢**。<sup>15</sup> 如果飢腸轆轆的釀酒師總是不得不去尋找口乾舌燥的麵包師，那麼生活會很乏味。這就是為甚麼我們一般用錢作交換媒介。用我們的剩餘產品換錢，然後再用錢換回我們需要的其他產品。

## 價值指數

但是，不論交易是否通過錢，不同商品的交換比例是由甚麼決定的呢？有些東西基本上沒甚麼用（如鑽石），但是“交換價值”卻很大，而特別重要的東西（如水）卻幾乎沒有甚麼交換價值。這讓斯密很困惑。現在我們可以用邊際效用理論來解釋：因為鑽石稀缺，再有一顆就很珍貴；但是因為水很多，再有一杯對我們幾乎沒甚麼用處。或者我們也可以借助供需關係分析來解釋這個問題。遺憾

---

14 《國富論》第一卷第三章。

15 同上，第一卷第四章。

的是，第一個工具邊際效用理論當時尚未出現，而在《國富論》這一章節，斯密還沒有把供需理論完善化。因此，他絞盡腦汁探索是甚麼使商品具有特定價值。

在原始社會，產品的價值起初體現的一定是生產該產品所投入的勞動。<sup>16</sup> 這在斯密看來是很自然的。畢竟，我們投入“辛苦和煩勞”來生產產品供出售，正是為了要省去親自生產所購商品的麻煩。買賣任何一方購買自己費力較少就能生產的產品，這對任何一方都毫無意義。因此，交換的理想比例應當反映等量的勞動。

在獵人之間，如果“通常情況下捕殺一隻海狸需要花費的勞動是獵殺一隻鹿的兩倍，那麼，一隻海狸自然應換取或等價於兩隻鹿”。<sup>17</sup> 當然，斯密指出，並非所有的勞動都是等值的。一種生產過程可能更辛苦，或需要更多的技巧，或需要長期訓練及經驗。但這些因素都會“在市場討價還價中”考慮在內。《國富論》這一部分被當作“勞動價值理論”（a labor theory of value）受到很多批評，隨後又讓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聲稱工人的勞動往往被資本家老闆竊取了。如果是這樣，那這一理論對我們這個世界並沒有任何好處。

然而，斯密並非真正地要把我們引向勞動價值論。他其實是在努力理解我們今天作為關鍵經濟指標的**生產**

---

16 同上，第一卷第五章。

17 同上，第一卷第六章第 65 頁第 1 段。

**總成本**這一概念。在狩獵社會，這些成本幾乎全是勞動。但我們已經發展超越了這一階段；斯密接着又明確了在更為現代的經濟制度中利用的其他**生產要素**即土地和資本。這一思想又成了當今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後來，斯密引入了供給和需求，不僅分析了其對價格的作用，而且論證了它們是如何推動整個生產和分配體制的。這是開創性的工作。在這一點上他花了幾章的篇幅，通過追溯社會的發展過程說明勞動不再是價值的唯一源泉。<sup>18</sup> 因此這些章節需要綜合來看。

### 土地、勞動和資本

無論從事任何現代生產，都需要人來做工，也需要工具和機器設備供人們利用來幹活，並且還需要工作的空間。斯密說，因此總成本可以分解為**三大生產要素**。<sup>19</sup> 和原始狩獵社會不同，這些要素由不同的人擁有，因此他們有權從生產所得中分得一份。首先當然是工人的**勞動**，這體現在**工資**上；還有僱主提供的**資本**（斯密稱 Stock），這體現在**利潤**上；還有**土地**的使用，這體現在付給地主的**租金**上。

因此，土地、資本和勞動都對生產有貢獻，從而使工人、僱主和地主相互依存。他們之間的依賴關係不僅

---

<sup>18</sup> 同上，第一卷第五到十一章。

<sup>19</sup> 同上，第一卷第六章。

體現在生產中，因為大部分產品是用來交換的，這三者也參與了該商品的估值和分配。斯密在逐步引導我們認識到一個國家的財富生產、估值和分配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為正常運轉的經濟制度中相互關聯的部分同時發生的，其中每個人都是經濟制度的一分子。這一點也是巨大的理論創新。

### 市場是如何推動生產的

接着斯密解釋了該制度是如何**推動和指導生產**的。他說產品實際交換的“市場價格”可能比其總成本（他稱之為“自然價格”）或高或低。<sup>20</sup>市場價格取決於該產品的需求（或至少是有錢買產品的顧客的“有效”需求）以及市場的供給。如果市場價格比賣者總成本要高，他們就盈利；如果低，則虧本。

市場價格永遠不可能長期低於生產成本：因為這樣的話賣方會退出，而不是一直虧損下去。但是，該價格也不會長期高於市場成本。如果真是高的話，就會使競爭者意識到有錢可賺。於是供給就會增加，從而市場價格就又会壓下來。因此行業目標就是為市場提供均衡量產品，不多不少。

當然，競爭可能會不完善。規章制度可能會限制市

---

<sup>20</sup> 同上，第一卷第七章。

場進入。壟斷者可能會通過減少市場供給而抬高價格。或者資訊缺乏：例如，更便宜的生產工藝的發明者可能享受超額利潤很多年，直到競爭者也發現這一工藝為止。因此，“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可能不一致。

### 工資水平取決於經濟增長

勞動力市場也有這種不完善之處。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可能互相依存，但是工人和僱主之間的鬥爭並非勢均力敵。斯密說，儘管僱主之間的聯合是“經常性的和一貫的”，<sup>21</sup> 但他們卻推動法律禁止工人聯合。但是僱主應當記住壓低工資其實是假節約：因為提高工資和改善條件會提高生產率，從而產生更高的收益。

斯密推測，國家收入以及資本積累不斷增長，這對工人最有利，因為這些會帶動工資上漲。地主收入有盈餘，就會僱用更多僕人。織工或製鞋匠有剩餘資本，就會僱用幫工。也就是說，當且僅當國家財富增加時，對勞動力的需求才增加。“勞動力的優厚報酬”完全取決於經濟增長。

然而，工資的真正衡量標準是用它可以買多少東西；斯密指出，儘管稅收提高了如蠟燭、皮革、酒以及其他那個時代的奢侈品價格，但是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

---

21 同上，第一卷第八章，第 84 頁第 13 段。



品卻越來越便宜，這多虧了市場制度。這一點很好，對窮人特別有幫助。因為“在任何一個社會，如果絕大多數人生活窮困悲慘，那麼，它就不可能繁榮幸福。”<sup>22</sup>

## 市場工資水平

斯密大膽地提出，理論上，勞動收益應當趨於一致。如果某個行業收入較好，人們就會從其他行業蜂擁而入。市場很快就會把收入拉平。那為甚麼現實中工資水平卻有高有低呢？

他的答案是我們不能只看“金錢方面的”報酬，還應當考慮非金錢方面的收穫。有些職業很艱苦或令人討厭（這就是為甚麼肉商和劊子手的工資比織工高的原因）；有些行業（如砌磚）是季節性的；還有些（如醫學）享受高薪是因為這些職業需要有公眾極大的信任；有些職業要花大價錢來學（如法律）；甚至在大量投入後，真正成功的機會卻很小（歌劇歌唱家）。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特定行業勞動力的市場價格。

## 工資和政治

但是政治因素也影響收入和利潤。規章制度會阻止人們進入某些特定行業。斯密舉了行業附則作為例子。

---

<sup>22</sup> 同上，第一卷第八章，第 96 頁第 36 段。

在謝菲爾德，禁止刀匠擁有一個以上的學徒。或者諾福克郡的織工和英格蘭的製帽匠不能超過兩個學徒。這些進入壁壘抬高了少數有資格的刀匠、織工和製帽匠的收入，但是，這只是通過剝奪他人的自身勞動權這一“神聖權利”才實現的。並且，工人從不景氣的行業轉到更需要他們的行業也被禁止。

對此，斯密有句名言：同行的人只要聚會，哪怕是為了娛樂或消遣，他們交往的結果幾乎毫不例外：要麼是串通起來對付公眾，要麼是巧立名目來漲價。<sup>23</sup> 但是（他馬上接着說）政客和法律串通一氣，因為它們通過並執行這些規定的結果是使同業者的合作更有可能並更高效。他指的是手工業行會享有的那些特權，這些特權自中世紀以來就一直小心翼翼地守護着其壟斷地位，對甚麼人以甚麼條件可以入會加以限制，對他們准許從業的人進行登記，並向會員收費籌資用於該行業中窮人的福利。

但是，法律如果規定某行業從業人員進行公開登記，斯密說，那麼，就會讓他們聯繫很方便，他們就更可能聚在一起搞串通。強制性的行業福利基金也讓他們不可避免地互相見面，因為從業人員不得不來交費。如果法律還進一步允許行會按多數原則投票決定政策，那麼它“比任何自發的組織都將更長期、更有效地限制競爭”。<sup>24</sup>

23 同上，第一卷第十章第二小節，第 145 頁第 27 段。

24 同上，第一卷第十章第二小節，第 145 頁第 30 段。

在斯密看來，對各行業唯一“真正有效的”約束是害怕失去顧客。<sup>25</sup> 在自由市場條件下，顧客是上帝，這是更有效的監管商業行為之道，比政府的多少規則都管用：政府政策的結果往往與其宣稱的目標相反。

### 資本和利潤

同樣不當的規定也影響下一個生產要素，斯密所稱之為 Stock(資本)。<sup>26</sup> 資本，他後來解釋說，<sup>27</sup>“包括直接使用的儲備貨物如衣服或食品；固定資本如機器設備；以及流動資本，包括正在生產的產品以及已經生產出來但是還放在貨架上尚未售出的產品。”

斯密指出，資本的利潤，也就是投資在生產企業的回報，變化很大。它取決於商品價格，以及競爭者的表現，還有“貨物在運輸或存儲時可能發生的”不計其數的意外事件。利率可以作為利潤粗略的衡量標準。如果人們願意支付很多利息借錢，這表明他們把這些貸款應用於生產時可以賺取大量利潤。

為了說明這一點，他談到美洲殖民地的利率很高，因為那裏的土地充足，但是用於耕種土地的資本和勞動力卻相對很少。結果，土地很便宜，但資本和勞動力很昂貴——這體現在那裏的高額利潤、高利率和高工資上。

---

25 同上，第一卷第十章第二小節，第 145 頁第 31 段。

26 同上，第一卷第十章。

27 同上，第二卷第一章。

## 土地和地租

斯密對土地和地租<sup>28</sup>的觀點表明他不喜歡僱主，對地主更沒甚麼好感。因為，地主享受“壟斷價格”，但並非出自個人的努力，而只是由於他們對土地的所有權以及土地的地理位置和肥沃。另外，富有的商人總想擁有大的鄉村莊園，這也增加了土地需求，並因此推高了土地價格和租金。

當然，土地既能提供食物和場所，也能生產礦物。斯密在“漫談銀子”的長文中收集了大量證據證明其觀點，即當國家收入增加時，工業品就會更便宜，但土地會更貴。

## 自動調節系統

簡單回歸一下：國家的“年產物”分解為租金、工資和利潤，這意味着土地所有者、工人和僱主必然是相互依存的。<sup>29</sup>他們是持續不斷的流動系統的構成部分。在該系統中，人們生產、交換、使用並替換商品，從而使資源得到最好的利用。所有這一切都是自動完成的。

但這一過程可能被既得利益者破壞。他們利用政府權力扭曲自由市場體制以牟取私利。土地所有者可能會過於懶散，而工人可能會過於弱小無力。但僱主卻既有動力又有敏銳的頭腦去推動打壓競爭的規則出台。因此：

---

28 同上，第一卷第十一章。

29 同上，第一卷第十一章。

在聽僱主階層提出的任何新的商業法律或規定時，人們都應當總是保持戒心。如果沒有長期仔細的審查絕不應通過。審查時不僅要非常細緻，而且要保持高度的懷疑。因為法律或規則是由這一階層提出的，而他們的利益從來就不會和大眾完全一致。並且，一般而言，他們有利益動機去欺騙甚至壓榨大眾，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還確實曾經欺騙和壓榨了大眾。

## 資本積累

《國富論》第二卷論述**資本積累**，斯密斷言它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剩餘產品的出現使交換和專業化成為可能。而專業化有助於創造更多的剩餘產品，而剩餘產品反過來又可以重新投資到新的節省人力的專用設備。這是個良性循環。由於有了資本的增長，繁榮的經濟就像一個不斷做大的蛋糕。一個人（或國家）不必變得更窮才能使另一個人變得更富。相反，當財富增長時，全體國民都更富有了。

## 金錢

斯密認為金錢沒有內在價值。<sup>30</sup> 它只是交換工具。真正的財富在於錢買到的東西，而不是錢本身。畢竟，

---

30 同上，第二卷第二章。

金銀的購買力會波動。另外，一個人今天掙了 1 畿尼 (guinea) 金幣，他明天可能就把這同一枚金幣花掉，這樣第二個人就掙到了 1 畿尼，而這個人可能第二天把同樣的 1 畿尼花掉，於是第三個人就收入了 1 畿尼。因此，流通的錢顯然和國家的總收入不同。重商主義者錯誤地把兩者混為一談。

然而，錢的確有作用。當閒置時，錢是沒用的工具即“死資本”。但高效的銀行業可以使之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斯密那個年代還沒有現在的紙幣（政府只是宣佈自己印的鈔票是法定貨幣），但是那時銀行卻可以發行由其黃金儲備支撐的票據。他認為，這樣可以使錢流通得更容易，儘管他覺得如果銀行過度發票據可能有風險——他寫作時，正值 1772 年銀行業危機剛剛過去，在這場危機中，蘇格蘭多家銀行倒閉。斯密認為銀行間的競爭威脅會讓其保持謹慎，但他仍然認為要對銀行進行監管。（斯密並不是反對所有的經濟監管：他反對的只是那些設計用來促進特殊利益而不是大眾利益的監管。）

## 消費和投資

斯密又一次開創性地區分了總收入和純收入——總收入減去成本。<sup>31</sup> 第三章在論述勞動和儲蓄時，他對此作

---

31 同上，第二卷第二章。

了進一步分析，該章是《國富論》核心部分，儘管他使用的術語可能會使現代的讀者感到困惑。斯密把勞動分為**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生產性勞動**是指勞動所得超過成本，並有盈餘可用來再投資的勞動——比如手工業者的勞動。而**非生產性勞動**則是指用於直接消費的勞動，如醫生或音樂家、律師、木偶戲表演者、政府官員或小丑演員等的勞動，並且這種勞動不會產生可用於再投資的收入。斯密是在區分製造和服務行業，而這種區分是當今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可是，消費這些直接服務後，我們用在資本維護和擴張的盈餘就減少了，而我們未來的收入就靠這兩者。現在消費得越多，未來的增長和收入就要放棄更多。

其實，我們可能消費過多以至於沒有任何盈餘來擴大生產能力。的確，消費過多，我們甚至都無法**維持**現有的生產能力。斯密認為，這等於**侵蝕**我們的資本，就像一個“敗家子”所做的那樣，沒有“量入為出”，而是把祖先節省下來用於維持營生的錢用在養閒人的工資上。<sup>32</sup>

資本也可能由於不良投資決策而浪費掉（斯密稱之為“錯誤行為”）。他提醒重商主義者說，這並不會減少國家的金銀存量，但肯定會降低其生產能力。另外，如果沒

---

32 同上，第二卷第二章，第 339 頁第 20 段。

有法治，資本還可能被竊取，從而根本上就使人們不大想積累資本。

但是，“大國從來不會因為私人的浪費和投資失誤變窮，反倒是政府的浪費和投資失誤有時會造成這種結果。”<sup>33</sup> 普通百姓懂得要想改善生活，就必須節省用來投資。但是，政府對維持資本的重要性並不重視：它們的職責是花錢購買當前的服務產品，而不是投資到生產上。斯密說，政府的幾乎所有收入因此都是用在供養**非生產性人員**上。因此：

國王和大臣聲稱要監管平民厲行節約，這最為厚顏無恥和專橫……他們才是社會中最奢侈的人羣，而且毫無例外，總是如此。如果他們鋪張浪費不會毀掉國家的話，其臣民就更不會。<sup>34</sup>

“政府揮霍無度”可能迫使納稅人“侵蝕其資本”，直到“個人再節儉、再明智都無法彌補由此帶來的產出浪費和減少”。但是，市場經濟依然非常有活力。大政府可能會使國家倒退，但卻很少能阻止其前進：

為改善自身境況，每個人都在努力，並且始終如

33 同上，第二卷第三章，第 342 頁第 30 段。

34 同上，第二卷第三章，第 346 頁第 36 段。



一。這一力量非常強大，足以維持社會自然的進步，儘管政府鋪張浪費，施政也有重大失誤。<sup>35</sup>

## 對資本的再思考

斯密認為資本有不同用途。<sup>36</sup> 有些資產（如漁場）提供直接消費品；另外一些（如機器）則用來生產或運輸原料及成品；另外一種資本往往為人們所忽視，但其實卻同樣重要並且同樣是生產性的，這就是零售資本，用它把商品分成很多小的可以消費的單位，這樣，人們想買肉時，就不需要買一整頭牛。（政府採取措施如給酒館發營業執照來限制任何地方的零售商數量，斯密對此的插話很有趣。他寫道，“酒館數量眾多，這並不是造成大家喜歡醉酒的原因，恰恰相反，是人們的這種癖好才必然為眾多酒館提供了生意。”<sup>37</sup> 零售業，和其他行業一樣，因需求而生。）

然而，《國富論》第二卷的核心內容是：節省一部分產出，而不是全部消費完，可以讓我們增加生產資本；這反過來又讓我們將來增加產出。這是財富增長的循環——與銀行金庫的金銀數量無關（請重商主義者注意）。

有了資本積累，就可以開發更多節省勞力的生產工

---

35 同上，第二卷第三章，第 343 頁第 31 段。

36 同上，第二卷第五章。

37 同上，第二卷第五章，第 360 頁第 7 段。

藝，培養更多的專門人才。勞動分工將會深化，斯密說，這相應地又需要更多的勞動力。當資本擴張時，工資就會提高。（斯密寫作時，工業革命的巨大作用尚不明顯，當時，手工勞動才是經濟的基礎。他看來沒有設想機器會取代人。）

換句話說，市場經濟在推動國民財富增長上的作用無與倫比，而財富則直接惠及到了最窮的工人。的確，採用市場經濟的富裕國家的窮人比沒有採用市場經濟的貧窮國家的富人生活得還好。這包含着經濟全球化的啟示：一個國家如果不去試圖保持自給自足，或者針對其他國家設置貿易壁壘，那麼，它就會更富有。

## 經濟制度史

在第三卷中，斯密有時通過對歷史進行推導，有時則通過大量歷史事實，考察了經濟關係的發展。斯密首先追溯了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的演變。他指出，城市的發展，以及城市和農村的相互依存，都是完全自然而然的。手藝人需要農民為其生產糧食，而農民也需要手藝人為他們製作工具，他們還需要城鎮來為其商品提供市場。的確，城市越大，市場越大。並非（如當時法國重農主義者所力挺的那樣）城市就是靠農村生活。雙方通過交換各自不同的產品都更富有了。

斯密記錄了歐洲封建制度的瓦解，並探索了羅馬帝國崩潰後封建法律的淵源，以及商業是如何導致其被取代的。<sup>38</sup> 在貿易和商業時代開啟之前，他推測說，財富在大地主手中。而這些大財主必然都成了當地的司法權威。然而這種權力卻很武斷隨意，於是人們制定了封建法律，試圖節制這一權力，儘管並沒有完全如願。但是，隨着貿易和商業的興起，地主的財富（以及權力）受到侵蝕，他們的家臣侍從變成了獨立的佃戶。這些佃戶現在有了自己的追求，便要求有更多的安全感。於是，封建制度讓位於法治，它既適用於有權勢的人，也適用於地位卑微的人。商業的發展終於把經濟力量和政治權力分開了——經濟力量的確強大。

在斯密看來，這是令人滿意的結果。因為這保護了資本，使貿易、商業以及製造業得以在民法的保護下發展。人們根本沒打算造福公眾，他們關心的僅僅是自己的財產和安全，但是，他們卻又一次共同造就了有利的結果。

## 經濟理論和政策

在第四卷中，斯密闡發了對經濟干預主義的批評。他首先批判重商主義的錯誤觀點和政策。重商主義者錯

---

38 同上，第三卷第四章。

誤地認為錢和財富是一回事兒，其政策則是限制進口和擴大出口，以便保有儘量多的金銀。<sup>39</sup>

### 重商主義者和金錢

斯密提醒我們，金錢只是促進交易的工具。因為外貿只佔整個商業很小部分，黃金的跨界流通幾乎不大可能摧毀一個大國。

當然能，重商主義者稱黃金是耐久品，向我們出口的國家可能在幾十年內惡意累積黃金，而我們卻愚蠢地用耐久品去換不耐久品。斯密反駁說我們很高興從法國進口（不耐久的）葡萄酒，並反過來向其出口（耐久的）五金產品。但是，法國人並不傻，他們不會囤積超出其實際需求的大量的瓶瓶罐罐。我們也不會傻到囤積超出我們需求量的金銀。過多的惰性金屬是死資本，而死資本不會讓我們富有。

### 絕對優勢

斯密接着指出，如果我們希望維持金銀儲備而限制進口，這意味着國內消費者選擇範圍變小：他們只能向國內生產者購買，而不能向很多外國生產者購買，但外國的產品可能更加物美價廉。<sup>40</sup>這就使該政策代價很大，

39 同上，第四卷第一章。

40 同上，第四卷第二章。

並且效果適得其反。正如不同行業之間進行勞動分工一樣，國家也應生產其最拿手的產品，並拿剩餘產品用於交換。這一論斷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絕對優勢**這一原理的早期版本。斯密用一個生動的實例說明了這一觀點。

通過建造玻璃房、溫牀和保溫牆，蘇格蘭可以種植上乘的葡萄，也可以釀造出上等的葡萄酒，但成本卻是從國外進口的至少同樣品質的佳釀的 30 倍。僅僅為了鼓勵蘇格蘭生產波爾多和勃艮第那樣的紅酒就禁止進口所有外國葡萄酒，這樣的法律合理嗎？<sup>41</sup>

這種干預不僅不合理，代價極高，而且還滋生腐敗：

如果政治家想要指導人們應如何利用其資本，那麼，問題不僅僅是他多此一舉，而且，權力還被其攫取，而這一權力不僅不可能放心地託付給任何個人，也不可能放心地託付給任何委員會或議會。這種權力落到既愚蠢又無恥竟然以為自己有資格發號施令的人手裏，那最危險不過的了。<sup>42</sup>

## 關稅和補貼

斯密承認，**臨時關稅**如果能迫使其他國家放棄關

41 同上，第四卷第二章，第 458 頁第 15 段。

42 同上，第四卷第二章，第 456 頁第 10 段。

稅，那麼可能還說得過去。但一般情況下，這些政策要麼毫無意義，要麼有害。對鼓吹這些政策的人要警惕。比如，英國對外國紅酒和啤酒徵收關稅的辯護理由是這會減少酗酒。但是，斯密反駁說，儘管人們有時會過量飲酒，但是，只要買的價格比我們自己釀造要便宜，那就仍然划算。他還提到英國關稅對葡萄牙比對法國要優惠，理由是，和法國相比，葡萄牙是英國產品更好的顧客。底層商人見不得人的伎倆就這樣被尊為一個偉大帝國行為的政治格言。<sup>43</sup>

斯密還告訴重商主義者說我們也不必擔心貿易逆差。只要一個國家生產比消費多，那麼其資本就在節餘和增加。它就可以進口超過出口但卻有剩餘產品，並更富有。

斯密對其他貿易干涉的研究，包括“退稅”（對出口商的減稅）和“獎勵金”（補貼），<sup>44</sup>反映了他那個時代有趣的一幕，而且有時妙語連珠，入木三分。例如：

發給白鯡魚漁業的獎勵金是一種噸位獎勵金。它是按照漁船的載重量發放，而不是按其捕魚的努力程度或業績發放。因此，我想，人們裝備船隻的唯一目的就是撈獎勵金，而不是撈魚。這已經是見怪不怪了。<sup>45</sup>

43 同上，第四卷第三章，第 493 頁第 c8 段。

44 同上，第四卷第四、五章。

45 同上，第四卷第五章，第 520 頁第 32 段。

## 殖民地的貿易限制政策

《國富論》出版後僅僅幾個月，美洲對英國政府強烈的不滿情緒演變成了公開的反叛。斯密論述殖民地問題的章節<sup>46</sup>透露出他同情美洲人民，這主要是因為重商主義者的種種限制措施損害了他們的貿易（在此過程中對英國也沒甚麼好處），另外部分原因是他感到，平心而論，美洲對英國的稅收貢獻很大，有權在議會中擁有更大的代表權。

在追溯殖民地的緣由時，斯密認為，建立殖民地，主要是希望找到金銀，這對重商主義者而言就是財富。但美洲的最大財富是土地，又多又便宜，需要很多勞動力來實現其潛在收益。這使勞動力很貴，但美洲農業產量很高，所以，還能付得起工錢。的確，美洲太富饒肥沃，甚至英國的稅收和貿易限制政策都沒有毀掉它（到現在為止）。

遺憾的是，由於政策強迫美洲只能與宗主國進行貿易，結果，把英國的資本和企業趕出了更高產的行業，從而壓制了其本身和美洲的繁榮，導致資本積累放緩，結果，雙方未來收入都下降。斯密說，英國試圖把美洲人都變成自己產品的“顧客”，但其政策卻把他們從農民變成了政治家：因為英國大部分工業集中在大西洋貿易上，政治風險很大。只有通過貿易和政治自由化才能降

---

46 同上，第四卷第七章。

低威脅，但是，英國的投資被嚴重扭曲，進行必要的調整將會很痛苦。英國對美洲貿易的限制措施是重商主義者生產商利益至上思維的又一例證。但是，“消費是所有生產活動的唯一目的，只有在必須照顧生產者利益才能促進消費者利益時，才應該對其照顧。”<sup>47</sup>

### 自由主義的選擇

斯密批評了法國重農主義者(physiocrats)的觀點，他們認為所有價值都來自土地和農業——城鎮的商人和“手工藝人”只是對財富重新分配，他們自己並未創造任何財富。斯密反駁說城裏人其實是進行生產的。他們不是僅僅消耗資本，他們是替換資本。他們是**生產性**而不是**非生產性**人員。

不過，斯密認為重農主義者的經濟哲學是比較好的。因為他們沒有錯誤地把產出等同於錢，而且他們也認為貿易完全自由是使產出最大的最佳途徑。

斯密認為，即使經濟自由並不徹底，但市場經濟很強大，依然能夠生存下去；自由經濟制度的好處是它是自動調節的。用斯密的話來說，“天賦自由制度簡單明瞭，是自然而然建立的”。人們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他們不自覺地促進了

---

47 同上，第四卷第八章，第 660 頁第 49 段。



每個人的利益，並不需要任何中央指導：

有一種責任，君主完全不用擔負，其實世上沒有任何人足夠聰明博學能擔當此任。這個責任就是監管個人的產業，並指導其用到對社會最有利的地方去。<sup>48</sup>

在斯密看來，這是很幸運的，因為任何制度如果試圖把資源引導到特定領域，那麼，“實際上它都會破壞其想要推動的宏偉目標。”<sup>49</sup>

## 政府的角色

在第五卷，斯密深入探究了政府應當扮演的角色。他對政府和官僚體制持批評態度，但也並不擁護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他認為他講述的市場經濟只有在遵守其規則——財產安全，合同被信守——的條件下才能正常運轉並產生利益。因此，**維護司法和法治**至關重要。

**國防**也一樣。如果我們的財產可能被外國掠奪，這和被鄰居搶奪一樣，我們也好不到哪裏。但是，斯密又進一步論辯說在提供**公共工程**和**促進教育**方面，政府也責無旁貸。

---

48 同上，第四卷第九章，第 687 頁第 51 段。

49 同上，第四卷第九章，第 687 頁第 50 段。

## 國防

斯密推測，在狩獵和拾荒的原始社會，每個人都得自衛。但因為狩獵者過一天算一天，幾乎沒有甚麼財產。所以，也就沒有必要建立中央權威。但是，到了農耕社會，人們開始積累財產（例如莊稼和牲畜），這樣，保衛財產就成了頭等大事。根據勞動分工原則，一支專門軍隊就成立了。那些財產最多的人受益最大，但他們卻迫使每個人都出錢，為了不讓其他人成為“搭便車者”（free riders）。這樣，國防就成了政府的一項職能。

## 司法

同樣的歷史論證方法也適用於司法。人們進入商業交換社會後，有財產的人便建立政府以保護他們免遭身無分文的人侵害：

富人的財富會激起窮人的憤怒。窮人缺衣少食，對富人羨慕嫉妒，這兩者常常驅使他們去搶奪富人財產。富人的財產是多年辛勞所得，或者甚至是連續幾代人辛勞所得。沒有治安法官的保護，擁有貴重財產的人連一天安穩覺都睡不成。<sup>50</sup>

---

50 同上，第五卷第一章第二小節，第 710 頁第 c2 段。

如果每個人都接受獨立法官的權威，這顯然很有好處。富人和有權勢的人都盡力為自己建立法律上的保護，而人們天性卻都尊重個人品質如力量、智慧、謹慎、成熟、財富和地位等的權威。因此，他們的努力得到了支持。

換句話說，文官政府是商業社會中出現的不平等和衝突的產物。這是一自然而然的結果，一般而言是有用的，但絕非完美。

文官政府，就其是為保護財產安全而建立這一點而言，其實是為了保護富人防範窮人建立的，或者確切地說，是為了保護有一些財產的人防範不名一文的人設立的。<sup>51</sup>

政府機構因為建立在不完善基礎上，所以其本身也不完美，這也就不足為奇了。政府有權收稅，這使其積累了巨大資源，但它卻並沒有多少動力像個人那樣高效管理其財產。因此：

當王室土地成為個人財產後，經過幾年時間，土地就會大有改善，得到精耕細作……君主從海關稅和國內消費稅得到的收入也必然會隨着人們收入和消費的增加而增加。

---

51 同上，第五卷第一章第二小節，第 715 頁第 12 段。

缺乏激勵措施這一點必須糾正：公職人員的報酬只能在提供公共服務後才發放，並且應按服務時的勤勉程度發放，只有這樣，公共服務才能做得最好。

## 公共設施和機構

斯密認為政府的第三項職能是“建設並維護某些公共工程以及某些公共機構，因為由個人或少數人建設並維護的話，他們永遠都是得不償失”。<sup>52</sup> 以上這些包括**促進商業和教育的基礎建設**項目，旨在幫助人們成為社會和經濟制度的建設力量。

## 公共設施

繁榮要靠商業，商業需要基礎建設，如道路、橋樑和港口。斯密認為，有些設施永遠也收不回成本，因此需要通過收稅集資來建設。但是，至少一部分成本可以通過向使用者收費來彌補，而不是向全體國民徵稅。同樣，如果地方是主要受益者，而收費又不能收回成本，那麼，**地方稅**就是最佳選擇。例如：倫敦的納稅人應當為這裏的道路和路燈交稅。

斯密也認為為鼓勵人們與“野蠻”國家開關貿易，政府特許權很有必要。但這種幫助只能以給與臨時地方壟

---

52 同上，第四卷第一章第三小節，第 723 頁第 c1 段。

斷（如專利或著作權）形式，而不是用全體納稅人的錢發補貼。

因為到目前為止《國富論》都一直在批評政府“指導國民的資本”，所以這些公共開支建議，往好的說，看上去有些奇怪。商業當然需要基礎設施，正如它需要法治一樣。然而，為甚麼道路、橋樑和港口不應當按商業模式興建並且其成本也不應全部從使用者收費中收回呢？這一問題就不那麼顯而易見了。甚至修路架設路燈都可以由當地企業來完成並支付，他們還因此有生意。如果值得開闢新貿易管道，為甚麼要政府參與呢？也許我們可以原諒斯密，因為現在我們有更多的金融工具可以為拓展新貿易以及建設基礎設施提供資金。我們向使用道路、橋樑以及其他設施的用戶收取費用的技術手段也更好。在十八世紀，有些項目雖然人人都認為很有必要，但是，由政府融資和建設似乎是唯一辦法。

## 對青年的教育

斯密認為發展基礎教育和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很相近，都是商業發展的必須條件。但這裏他的分析和對策又一次似乎與其總體分析不一致。

他的出發點是，勞動分工儘管有其好處，但可能會有不良社會後果。每天都投入到重複性工作中必然會使人視野及興趣狹隘：

一個人傾其一生都在做幾項簡單操作，操作結果也許也完全一樣，或差不多一樣，這樣，他就沒有機會去開動腦筋，或者施展自己的發明才能去找到解決難題的好辦法。因為他從沒碰到過難題。<sup>53</sup>

馬克思後來稱之為“異化”，斯密則堅持認為這需要教育來糾正。教育的重點應該是幹活打工的窮人，因為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手工業者和貿易商的工作更有挑戰性）。為了促進商業發展，斯密說，人們要“會讀、會寫和會算”；幾何和力學也很有用。

“國家”可以通過辦學推動這種教育，如斯密在寇克卡迪所上的學校就是由當地政府出資的。但是，雖然國家可以花錢為學校蓋校舍，卻不應支付教師工資的全部。如果教師靠學生付費生活，那他們的工作表現就會更好。斯密講到他在牛津大學求學經歷時憤憤不平，因為那裏“學校和學院有了捐贈款，必然會或多或少地降低教師努力工作的必要性。他們的生活水平與其在各自專業的成功與否以及名聲完全不相干。”<sup>54</sup>

在政府究竟應當在基礎教育上支出多少這個問題，斯密一直含糊不清，儘管他表示非常欽佩教授如擊劍和舞蹈等技能的私立學校，因為學生要全額付費。斯密對

53 同上，第五卷第一章第三小節，第 782 頁第 f50 段。

54 同上，第五卷第一章第三小節第二部分，第 760 頁第 f5 段。

政府辦事業有過警告，現在的讀者記住了這點，因此可能會問：補助貧困學生而不是學校是不是更好。

### 對所有年齡的人的教育

斯密還認為政府應促進成人教育和宗教教育。如果有什一稅支付牧師的工資，他們就會變懶。但是不斷擴張的城市帶來了各種誘惑，這意味着宗教和道德教育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重要。因此他宣導政府應在鼓勵科學、哲學和藝術研究方面發揮一定作用，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他還是沒有具體解釋。另為，他爭辯說，政府應當“認真”克服國民懦弱這一“精神殘疾”，正如應當阻止“麻風病或任何其他討厭的疾病”傳播一樣。<sup>55</sup>

### 君主

用稅收支付的最後一項是維護“君主尊嚴”，這包括王室和刑事司法制度的開支。但是，斯密認為**民事司法**的開支大部分應當由訴訟當事人支付，因為他們才是主要受益者。

---

55 同上，第五卷第一章第三小節第二部分，第 787-8 頁第 f60 段。

## 稅收原則

在證明至少有些稅收是必要的之後，斯密轉向了該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去徵稅這一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更為熟悉和有把握。他深知：一個政府向另外一個政府學習經驗時，學得最快的就是如何從人們口袋裏搜刮錢財的經驗。<sup>56</sup>

因此，對稅收顯然有必要加以限制。斯密提出了四條著名的稅收原則。首先，人們應當根據其在政府保護下所得到的收入按比例交稅。第二，稅額要明確，而不是由稅務官員隨意決定。第三，交稅要方便。第四，稅收的副作用要最小：徵稅成本要低廉；不能妨礙人們的產業和創業精神；不應太過繁重，以至於刺激人們去逃稅，比如走私；並且不能規定“收稅人員頻繁來訪並進行令人討厭的檢查”。<sup>57</sup>

斯密認為稅收這件事政府必須做好。例如，對企業徵稅是不明智的，因為——正如他精闢地分析一樣——我們收入所依賴的資本其流動性很大：

資本的擁有者可以說是世界公民，並不是必然依附於某一國家。如果他所在的國家為了弄清他要交的

56 同上，第五卷第二章第二小節第一、二部分附錄，第 861 頁第 b6 段。

57 同上，第五卷第二章第二小節，第 827 頁第 b6 段。



沉重稅金，對他進行調查，使他不勝其煩，那麼，他往往會離開這個國家，並把資本轉移到其他國家。在新的國家，他可以更自在地重操舊業，或者享受自己的財富。<sup>58</sup>

但是這裏斯密提出的方案也有前後不一的情況。他反對消費稅，但卻支持奢侈品稅（包括今天看來是必需品的東西，例如禽肉）。他說人們應當根據收入按比例交稅，但卻要富人繳納“高出這一比例的稅”。

## 公債

儘管斯密有關政府職能的有些觀點似乎與其一般原則不盡一致，而且他提出的政策措施似乎也沒有像他往常那樣進行嚴密的深思，但他在結尾部分又恢復了往常那種嚴密風格。他指出政府都傾向於多花錢，多得甚至要超出從人們口袋裏搜刮來的錢。因此，在《國富論》結尾，他最後警告說國債龐大特別不利。<sup>59</sup>

通過發行公債，政府抽走了用於投資和增長的資本，並把它用於直接消費中——通過政府行為——這意味着增長必然受阻。另外，通過政府舉債，無需向人們徵更多的稅，政治家就可以承擔更多職能，更加有

---

58 同上，第五卷第二章第二部分，第 848-9 頁第 f8 段。

59 同上，第五卷第三章。

權。並且他們經常有辦法不還債。基於以上原因，國債不是資本從一個羣體到另一個羣體的良性流動，它是對自由的真正威脅，也因此成為繁榮的真正威脅。

## 今日的《國富論》

毫無疑問，在工業革命改變一切之前，斯密生活的世界和我們有很大不同。股份公司是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他對其持懷疑態度，並爭辯說“大量的股東永遠都無法讓他們形成合力”，或許他是對的。他沒有預見到工會勢力的崛起、工業污染問題、紙幣貶值以及其他很多困擾現在經濟學家的問題。

然而，《國富論》證明人們工作、交易、節省以及投資的自由和安全保障可以促進繁榮，並且無需權威指導，從而留給我們一整套有力的方案去解決這個世界拋給我們的最棘手的經濟問題。自由經濟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和靈活性，能夠頂住新問題的衝擊，並能應對任何未來出現的問題。



第四章

《道德情操論》

---

《道德情操論》於 1759 年出版，當時斯密 35 歲，該書是他根據在格拉斯哥大學教授倫理學時的講稿整理寫出的。這本書不容易看懂——斯密還講授修辭學和文學風格課程，其用語比現今哲學家寫的簡潔的科學散文更華麗。的確，斯密的朋友埃德蒙·伯克說這本書“更像一幅畫，而不是一本書”。因此讀時需要細嚼慢嚥。

---

## 該書的主題

然而《道德情操論》確實是科學上的突破。它表明，作為社會動物，我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是我們本性的結果。它認為這種社會心理學是比理性更好的道德行為指南。它明確了社會生存所必需的**謹慎**和**正義**的基本規則，並解釋了使社會興旺的**善行**。

### 私利和同情

作為個體，我們都有照顧自己的天性。這只是審慎。而作為**社會動物**，斯密解釋說，我們也天生具有對他人的**同情**（現在這個單詞 sympathy 已經有了其他含義，用 empathy 表達更貼切）。當我們看到他人憂傷或高興時，我們也為他們難過或開心，儘管沒那麼強烈。同樣，其他人尋求我們的同情並感受我們的感受。但

是，當他們情緒特別強烈時，我們並沒有那麼強烈的反應，為了和我們保持一致，同情會促使他們克制自己的感情。慢慢地，當我們從兒童長大成人，我們每個人都懂得哪些行為別人可以接受，又有哪些他人不能接受。道德來源於我們的社會性。

### 正義和善行

正義也是源於我們的社會性。儘管我們自利，我們還得解決如何在不傷害他人的情況下與人相處的問題。這對社會的生存而言是最低要求。如果人們進一步去做好事——行善，對此我們當然歡迎，但我們不能夠像要求正義那樣要求人們行善。

### 美德

審慎、正義和善行都非常重要。然而最理想的狀況必須是，任何沒有偏見的人——不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出來的——斯密稱之為**客觀的旁觀者**，都會完全同情我們的感情和行為。這需要有自制，而真正的美德就在於自制。

## 天生的同情是美德的基礎

是甚麼造成我們的行為正確或錯誤？斯密時代的哲

學家們都在尋找這一問題的理性解釋。但斯密卻認為我們的道德並沒有那麼複雜難解，相反，它很自然，是社會動物與生俱來的。我們每個人都對他人<sup>60</sup>產生同情，很直接、真實、友善並且自然而然。我們在想像中把自己放在了他人的位置上。要是看到有人要被打，我們會本能地退縮，當我們目不轉睛看演員走軟繩時我們也會隨着他扭動身體。我們看到人們高興或憂傷時，我們也會感到高興或憂傷。

同樣，當看到人們以我們贊成的方式行事時，我們也會產生同情。其實，和他人有同樣感情或意見時，我們會感受到真正的快樂。<sup>61</sup>當我們和他人情感不同或不贊成其行為時，對雙方而言都很痛苦壓抑。

然而，斯密說，我們同情的其實並不是情緒本身，而是造成這種情緒的局面。我們見到有人發怒，那麼，起碼在我們了解這事情的來龍去脈並對他發火是對是錯做出判斷之前，我們更可能擔心他的怒火可能撒向受害者，而不是也跟着他發怒。如果我們認為人們對某一事件反應過度，那麼，他們就會失去我們對他們的同情。

### 不一致以及自制

斯密指出，我們只是旁觀者，不能完全體驗到他人情緒的強烈，比如某人被冤枉後的熊熊怒火，或者剛剛

---

60 《道德情操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第9頁第1段。

61 同上，第一卷第一篇第二章。

失去親人的傷心欲絕等。我們同情的情緒儘管真實，但卻必定沒那麼強烈。但其他人也是我們情緒的旁觀者，正如我們是他們的旁觀者一樣。當他們的情緒和我們不一致時，像在上面的例子中，他們就感到痛苦。這反過來會促使他們克制原先激烈的情緒，以便使之與我們看到他們困境時產生的情緒一致。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我們學會了這種自制。我們的本性讓我們站在他人角度來看問題，並懂得過分生氣或悲傷或其他情緒會讓別人痛苦。因此，我們儘量克制自己的情緒，以使其與他人一致。其實，我們的目標是把情緒控制到一定程度，從而任何典型的、公正的人，斯密稱之為**客觀的旁觀者**，都會對我們產生同情。

同樣，當我們關心他人時，我們知道一個客觀的旁觀者會贊成，而我們也從中得到了快樂。客觀的旁觀者可能是真實存在的或者只是假想的，但都對我們有指導作用：通過經驗，我們慢慢形成一套行為標準即道德。這有助於社會興旺。其基礎就是同情：

因此，多同情他人而少可憐自己，克制私心而盡獻愛心，正是這些品質構成了完美人性。並且，也唯有這樣才能使人們各自不同的情感和激情和諧一致，而正是這種和諧一致體現了人類社會全部的美德和禮貌。<sup>62</sup>

---

62 同上，第一卷第一篇第五章第 25 頁第 5 段。



## 獎勵、懲罰和社會

斯密研究了諸如飢餓、愛、善良和仇恨等各種情緒的合宜性問題之後，轉向應當獎勵或懲罰甚麼行為這一問題。

他告訴我們，要對此做出判斷，我們要把結果和動機區分開。如果有人因他人幫助而受益，我們不能完全同情受助者的感激之情，除非行善者行為動機是我們所認同的。我們也不能對某人因受傷害而產生仇恨表示同情，除非傷害行為的動機是我們所不贊成的。只有在助人行為是出於好的動機的情況下，我們才會認為該行為應當獎勵。同樣，只有在傷害行為是出於不良動機時，我們才認為應當受罰。

獎懲有一項很重要的社會功能。我們贊同並獎勵造福社會的行為，不贊成並懲罰危害社會的行為：“社會存在本身就要求用適當的懲罰抑制不當的、無緣無故的怨恨，因此，對怨恨實施懲罰應當被認為是合適並值得稱道的行為。”<sup>63</sup>

這一過程是本能的：我們可能不是特別清楚個人行為是如何造福或危害社會的，而我們的理性也不能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自然，或者說上帝，讓我們有憎有

---

63 同上，第二卷第一篇第五章第 77 頁第 10 段。

愛，從而實際上促進了我們人類和社會的繼續存在。的確，如果我們不是這樣，那麼，社會就將四分五裂，而我們作為社會動物也將很快消亡。

斯密很少談到“看不見的手”，但是卻多次闡明我們的行為是如何恰恰打造出一個運轉正常的社會秩序的，儘管我們行動時並沒有想達到這一目的。下面這個例子說明了他的意思。例如：錶的齒輪共同轉動來顯示時間，但齒輪並不知情，顯示時間是製錶人的打算。同理，當我們出於本能行動時，促進了社會發展，我們可能自負地把這一成果歸於我們的理性，但其實我們應把它歸功於自然或上帝。<sup>64</sup>

人們的行為造就了正常運轉的社會秩序，但這並不是人們的初衷。斯密討論這一現象時，他所用的“上帝”、“自然”、“自然之主”等詞幾乎可以互換。斯密對我們通過行動無意間打造出了和諧社會這一問題的闡述所用的是系統方法，而不是神學方法。它既沒假定也沒有要求神的干預。自然——或者用我們現代語言講，進化——完全可以產生相同結果。

這把我們又帶回到動機問題上來。<sup>65</sup>存心想要害人的行為可能事實上沒有造成傷害，而另外一些行為即使根本不想害人但卻造成了實實在在的傷害。

64 同上，第二卷第二篇第三章。

65 同上，第二卷第三篇第一、二章。

那我們應該懲罰動機還是結果？斯密回答說我們無法查看人的內心：如果只懲罰壞動機，那麼就沒有誰不受懷疑。但是自然又一次引領我們找到更為穩妥的解決辦法：我們只懲罰產生危害的行為以及企圖產生危害的行為。

## 公正是基礎

一個社會要生存，必須要有規則防止其個體成員互相傷害。正如斯密所說，搶劫者和謀殺者構成的社會也可能存在下去——但是只有在他們不去相互搶劫和殘殺時才行。這些就是我們稱為正義的規則。

如果人們可以幫助他人但卻不幫助，或者未能回報別人的善行，我們可能會說他們不仁慈或忘恩負義。但是我們並不會懲罰人們而逼迫他們行善，我們懲罰的只是確實造成傷害的行為以及故意傷害的行為。我們只強迫他們遵守公正原則，因為非如此社會便無法生存。<sup>66</sup>

正義的目的是防止傷害，而不是使善行最大化。例如，我們不會僅僅因為某物對人們用處更大而允許他們偷別人的東西。<sup>67</sup> 因為每個人都往往認為自己的利益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重要，所以，如果允許的話，我們就會

---

66 同上，第二卷第二篇第一章。

67 同上，第二卷第二篇第二章。

面臨無數的搶劫。正義關乎如何使社會免遭傷害，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自然賦予我們最強烈的維持正義的本能。我們對不公深惡痛絕，因此，那些做事不公的人會深感羞恥和悔恨。

## 自我批評和良心

其實，斯密說，自然已經賦予了我們甚至比懲罰更直接的手段，即自我批評。我們作為公正的旁觀者，不僅僅是衡量他人的行為，而且也衡量我們自己的行為，因此我們有時是行為者，有時是法官。<sup>68</sup>而內心深處的法官，不只是要求得到他人的稱讚，我們也想要**配得上**他人的讚揚，只有在感到別人對我們的看法是我們真正應得的情況時才會滿意。<sup>69</sup>

斯密認為，良心有強大的社會作用。它防止我們變得過於關注自己的命運，並對他人的命運過於漠不關心。在一個有名的例子中，他說如果大地震把全體中國人都毀滅了，生活在歐洲的人可能會有些傷感，但和因個人不幸帶來的痛苦相比，那種傷感根本不值一提：

---

68 同上，第三卷第一章。

69 同上，第三卷第二章。

假如他明天會失去一根小指，那麼，他今晚就無法入睡；但是，如果他沒見過他們，那麼，儘管自己的同類死了1億，他也會極其安穩地呼呼大睡。看來，很明顯他更關注個人微不足道的不幸而不是這一巨大傷亡。<sup>70</sup>

當然，其實所有個體都同等重要。自然用良心提醒我們這一點。我們會僅僅為了保住自己的小指而犧牲數億計人的生命嗎？當然不會，我們的良心絕不允許我們這樣做。良心為我們提供了準則：它阻止我們過於自我迷戀，使我們不願意僅僅因為個人私利而傷害他人。它讓我們自我控制自己的低級慾望。

## 道德規則

我們的天性是制定並遵守規則，這是上述過程的基礎。斯密說，當看到人們表現差時，我們內心的法官迫使我们決心不做同樣的事；當他人表現好時，我們會決心仿效他們。在對無數行為做出上述判斷的過程中，我們逐漸形成了行為規則。<sup>71</sup>這意味着我們不必再重新考慮每個新的場合：我們現在有指導我們行為的道德標準。道德標準會讓我們產生“義務感”，幫助我們忠實於正

70 同上，第三卷第三章，第 136-7 頁第 4 段。

71 同上，第三卷第四章，第 159 頁第 7-8 段。

義、誠實以及禮貌原則，不論當時我們有甚麼樣的感受。

這種穩定性對社會秩序很有好處。憑良心行事，我們最終肯定會在無意之間促進人類的幸福。<sup>72</sup>人們制定的法律，有獎有罰，可能也是要達到這一結果，但是，和良心以及由自然所設計的道德規則相比，法律卻從來都不如前者一貫、直接、有效。

斯密承認道德規則確實會隨時間和地域不同而有變化，正如不同文化對美有不同的觀念一樣，根據他們所熟悉的生活，他們也有關於“行為美”的不同概念。<sup>73</sup>例如，婚姻習俗不同，性行為規範不同，熱情好客或禮貌標準也有不同。但是，斯密堅持認為這種習慣或風俗的區別必然是次要的。除非自然的基本準則繼續被遵守，否則，社會就無法繼續生存。

## 對財富的態度

另外一個因素也會影響我們的道德判斷，這就是財富，並且這種影響並不總是正面的。斯密對這個問題深入思考寫成的長篇大論，肯定會讓幼稚的批評者們感到震驚，這些人（追隨卡爾·馬克思）把他想像成了追求物慾的支持者。

他堅持認為錢能買來的生活便利條件其實微不足道

72 同上，第三卷第五章。

73 同上，第五卷第一、二章，第 200 頁第 1 段。

道。精緻的外套並不比粗糙的外套更能防風雨；一個富人也不比其他人多吃甚麼；住在簡陋的小房子裏的勞動者可能比住在大宮殿裏的君主睡得更香。財富也不能把我們從恐懼、悲傷或死亡中解救出來。

然而，我們依然相信錢能買來幸福，富人和名人肯定幸福。的確，他們運氣好，我們替他們高興，他們的生活吸引我們的興趣。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這當然很讓人愉快。因此對富人而言，財富帶來的主要好處不是買來的微不足道的生活舒適品，而是財富所引起的大眾的關注這一榮幸。

但是，這很虛榮。因為公眾之所以感興趣，主要是因為其擁有財富或地位，而不是擁有者的品格。甚至人們一無所獲也往往忽視富人的“缺點和愚蠢”並奉承他們。結果，那些擁有財產或地位的人逐漸就會認為他們真的應當受到所有那些不實的誇獎，即使實際上他們連一句都不配得到。

## 自我改善

然而追求財富的確帶來其他好處。<sup>74</sup>當人們看到富人的大房子或華麗馬車，就誤以為他們生活舒適安逸而羨慕這種生活。斯密說，奇怪的是，人們為了过上這種舒

---

74 同上，第四卷第一章。

適安逸的生活，卻甘願一生受累，拼命工作。人們以為財富會帶來快樂——其實是誤會——這樣，就會驅使我們在物質生活領域拼搏，並使我們精神和藝術生活方面也取得巨大進步：

正是這一假像刺激人們不斷辛勤勞動。正是這一點最初促使他們開墾土地，建造房屋，建立城市和聯盟，創建科學和藝術並加以改進。科學和藝術使人類生活崇高而美麗，它徹底改變了地球的面貌，把自然界的原始森林變成了肥沃宜人的平原，把毫無用處的海洋打造成新的巨大生活來源之地，把不能通行的海洋打造成通往世界不同國家的交通要道。

然而富人並不比窮人消費得更多，他們只是挑選更加珍貴或更加稱心如意或更加精緻的東西。他們需要僕人服務，他們買的小飾品也需要有人打造，這樣，富人就給這些人提供了工作，他們獲得的財富也就分流到了整個社會。確實，他們“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領着對生活必需品進行分配，結果和土地被均分給全體人民後個人所得幾乎一樣”。<sup>75</sup>

---

75 同上，第四卷第一章，第 184-5 頁第 10 段。



## 論美德

在確定道德的起源和本質後，斯密在《道德情操論》的結尾定義了一個真正道德高尚的人的品質。這樣的人，他認為，體現了**審慎**、**正義**和**仁慈**等品質。第四點**自制**，也很關鍵，儘管它並不是行善的推動力。

**審慎**針對個人所關心的事情。它可節制人們的過分行為，也因此對社會很重要。審慎即使不是特別可愛，也是值得尊重的。<sup>76</sup> **公正**針對的是限制我們對他人的傷害。這對社會生活的延續很關鍵。**仁慈**因為促使我們提升他人的幸福而可以改善人類生活。我們不能要求任何人仁慈，但我們總欣賞仁慈。**自制**則緩和我們的激情。（恐懼可能會遏制我們的憤怒，但我們安全後就會又發怒。但是，通過自制，我們緩和怒氣以便和他人同情，怒氣就真的減少了。<sup>77</sup>）

我們的天性是最關心自己，然後是家人，再然後才是朋友以及關係更遠的人。<sup>78</sup>和其他國家比，我們往往更愛自己的國家。<sup>79</sup>但是，斯密爭辯說，真正的仁慈是沒有邊界的。因為人類比任何個人都更為重要，所以一個真正道德高尚的人會願意“為了更大的世界利益”做出個

---

76 同上，第六卷第一篇第一章。

77 同上，第六卷結論，第 263 頁第 3 段。

78 同上，第六卷第一篇第一章。

79 同上，第六卷第一篇第二章。

人犧牲。<sup>80</sup>

## 建設道德高尚的社會

天性的確促使個人犧牲自我，而我們也敬重這種自制，它使人們作出自我犧牲。但是人們既可以為善而犧牲自己，也可以為惡而犧牲自己。英雄的自制力可能轉變為極端分子鋼鐵般的意志。

對人類的愛不同於對自己國家的熱愛。<sup>81</sup>後者包含對國家體制和機構的尊重和敬意，以及希望自己的同胞生活幸福。通常，這兩者是一致的，但在政治動盪時期，也可能發生衝突。

在衝突情況下，政治家可能會不得不提出大刀闊斧的改革計劃。斯密說，他們會建議推翻現有的制度，根本不考慮舊的制度所帶來的好處。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提出的“理性的”選擇。但這有悖於人性：

體制內掌權的人……往往很自負地以為自己很聰明；對自己提出的所謂完美的政府方案常常迷戀不已，以至於不能容忍對其任何部分進行哪怕是最小的改變……他似乎設想自己可以輕鬆自如地對一個龐大

80 同上，第六卷第三篇第三章，第 235 頁第 3 段。

81 同上，第六卷第二篇第二章，第 229 頁第 4 段。

社會中的不同成員作出安排，就像用手移動棋盤上的棋子那樣。他沒有考慮到，在人類社會這個大棋盤上，每一隻棋子都有其行動規則，並與立法機構可能想要強加給他的全然不同。<sup>82</sup>

自由和天性比激進分子和空想家過於自負的理性能為建設和諧、正常運轉的社會提供更加可靠的指導。

---

82 同上，第六卷第二篇第二章，第 233-4 頁第 17 段。

## 第五章

# 斯密的講義和其他著作

---

斯密要求在他死後把他未出版的論文絕大部分都燒毀（這在當時是很正常要求，因為作者想要人們根據他們完成的作品來評價他們，而不是根據草稿）。因此，除了《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之外，他寫的東西很少留下來。然而，就是僅存的著述也表明斯密學識和興趣非常廣泛：為塞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的《詞典》（*Dictionary*）寫的書評；研究歐洲學術發展趨勢以及語言起源的文章；論述藝術——包括繪畫、戲劇、音樂和舞蹈等的論文；論述英國和義大利詩歌的評論；研究古代物理學史和哲學史的論文；以及一篇 70 頁的《天文學史》（*The History of Astronomy*）論文。

幸運的是，我們還有他的一些學生在聽其《修辭學和文學講座》（*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以及《法理學講稿》（*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時記下的筆記。儘管這些並不是斯密所寫，但卻可以讓我們洞察其在格拉斯哥時的思想發展過程，並且很多段落都在《國富論》中重新出現。

---

## 統一的主題

儘管斯密在各種講座和著述中講到了大量不同主題，但是都揭示出他的研究方法中極其重要的一點。那

就是與其說他是個經濟學家、或者道德學家、或者歷史學家、或者語法學家，倒不如說他是位社會心理學家。他了解人腦是如何應對客觀世界並與其他人打交道的，以及它又是如何從這些關係中做出傑出發明和創造的。科學在他看來與其說是研究現實世界，倒不如說是研究人腦如何按自己的方式分析並重組現實世界。語言、道德和經濟學都是人們見解相同才產生的有用的社會體系。法律和正義則是關於人類是如何確保和平相處的。

斯密的解釋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進化論**的解釋。自然賦予我們天性，天性共同作用使更大的社會機構為公眾利益服務。我們個人與他人討價還價、交流或相處，這些活動如何會產生一般的、有益的經濟、語言或正義制度，對此我們可能不明白，但事實就是這樣。的確，如果不是這樣，這些活動還具有破壞性，那麼社會將無法生存。斯密想要弄清的問題是個人行為與全體人員的行為之間的關聯。

## 斯密對科學哲學的評論

因此，《天文學史》目的不只是講述天文學史話，正如書名的全稱所示：**論引領和指導哲學探索的諸原則：以天文學史為例**。它其實是研究人腦以及人們是如何分

析、整理以及理解世界的。書中一開始就問是甚麼導致我們要創建理論，然後說明理論是如何提出、驗證和替代的，接下來又以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的著作作為實例研究“好”理論的特點。出人意料的是這些觀點都很現代，因為它把科學看作是人們創建客觀世界的模型的嘗試，它講的不是“現實世界”，而是人類心理學和對世界的解讀。

### 未知事物帶來的煩惱

斯密指出我們對熟悉的事物不以為然，不去思考。但當新事物出現時，就會令人驚訝。<sup>83</sup>我們會猜想它們如何能與我們熟知的世界融為一體。<sup>84</sup>感到有東西不協調會讓人不舒服；但是，我們的理性和想像力，以及抽象和分類能力幫助我們把新事物納入舊體系中。例如：我們看到一塊鐵被磁鐵吸住會感到很驚訝；但我們的想像力認為有某種力在磁鐵周圍旋轉，從而幫助我們解釋這一運動。這是很粗糙的理論，但斯密想要表明這類理論是如何提出、驗證以及改進的。

---

83 《天文學史》第一篇。

84 同上，第二篇。

## 猜想及反駁

斯密利用天文學史作為例子來說明這一點。<sup>85</sup> 對古代的天文學家而言，要做出解釋的“異象”是太陽、月亮和星辰的運動。一種理論認為天空就是個穹形屋頂，這些天體都掛在頂上，每天從東向西運動。遺憾的是，這無法解釋星球的不規則運動。因此，一種更為複雜的理論被大膽提了出來：其實有幾個球形天空，一個有規則地從東向西運動，另外一些（攜有星球的），運行不太規則。但這一不規則運動本身也需要解釋。因此，人們假定的球形天空越來越多，每個都以不同的方向圍繞另一個旋轉。人們最終假定有 72 個球形天空。這一解釋唯一的麻煩是：“這一理論已經變得和人們觀察到的現象本身一樣複雜難解，可是人們創立理論就是要使雜亂無章的現象統一有序。”<sup>86</sup>

後來的天文學家探索用更為簡單的方法解釋星球的運動。哥白尼（Copernicus）提出的理論把太陽而不是地球作為球形天空的中心。這樣以來，行星不規則的運動就更容易解釋，因為在這一理論中地球也在運動。儘管地球不是宇宙中心這一思想讓很多人大大為震驚，但是，天文學家卻覺得很有用——至少在更精確的觀察揭示出其不足之前是這樣。

但是隨後艾薩克·牛頓提出了簡單、一般性的解釋：

85 同上，第四篇。

86 同上，第四篇第 8 段第 59 頁。



它不僅回答了行星是如何完全按人們觀測到的模式運行，而且說明了為甚麼會這樣。這就是引力的作用。幾條簡單的物理規則就解釋了行星運行的橢圓軌道以及出現的如彗星等其他現象，而這些在哥白尼學說中無法解釋。牛頓的理論看上去很簡單，甚至優美；並且它與觀測到的現象吻合。

### 科學和人類理解力

對斯密而言，科學方法無疑是靠人腦來解釋宇宙的過程；並在這一過程中化繁為簡，提出我們能理解的原理。各種宇宙模型提出後，經檢驗發現不足，再修改，如果過於雜亂或與觀察到的現象衝突，就會被拋棄，而代之以更簡約的解釋。這種觀點很現代，很了不起。

有些理論把紛繁多樣的現象歸結為“幾條普遍原理”，體現出了一種美。這是因為科學是我們自己的心理結構。對斯密而言，所有科學模型——用他的話來講，“所有哲學體系”——“都只是人們想像力的產物”。<sup>87</sup>

## 交流心理學

在《修辭學和文學講座》中，斯密的研究對象其核心其實也是人類心理學和從中引申出來的關鍵的社會機

---

<sup>87</sup> 《天文學史》第四篇第 76 段第 105 頁（另見第二篇第 2 段第 46 頁）。

制——交流的發展過程。例如，斯密建議，如果你面對的聽眾認同你，就把全部資訊講給他們，然後一點一點地解釋。但如果面對的聽眾不贊同你，那就不要一下子把你**有爭議的結論**講出來刺激他們，而是逐步講出來。

在斯密的講稿——這僅見於其學生所做的筆記——以及有關“關於語言起源的思考”論述中，斯密試圖通過研究語言是如何產生來理解語言。因為沒有文字記錄，斯密對語言形成的敘述當然是推測性的，他舉的例子也僅限於幾種古代和現代的歐洲語言。但其解釋卻是進化論的：他認為語言也像人類社會一樣是發展的，並且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工具。

## 交流和人性

因為語言是人腦的產物，他斷言說，所以語言也揭示出了我們人性的一些方面。例如，拿分類能力來說，這一點在“天文學史”中已經講過。斯密認為早期各族人民可能任何事物所起的名稱都不同。這會極其不便，但幸運的是，人腦的抽象功能幫助解決了這一點。我們發現不同事物中有共同特點，因此就用一個詞表示一類事物——比如說**樹**。我們還定義像顏色之類的特徵——如**綠樹**——或相互關係——如**山洞上的樹**。<sup>88</sup>這種技巧

88 《修辭學和文學講座》第三講，第 19-24 卷，第 10-11 頁，以及《關於語言起源的思考》(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Formation of Languages) 第 12 段第 209 頁。

對科學方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對理解我們日常生活也同樣非常寶貴。

斯密決心把辯論技巧應用到研究對象上，這種方法貫穿其從《國富論》到《修辭學和文學講座》等所有的研究。在《國富論》中，他的研究是確定推動人類生產和交換的動機，並把它們分解成部分。在《修辭學和文學講座》中，他要發現人類交流背後的心理並分析其結構和方式。

### 交流的科學

其實，斯密很關注風格。他堅持認為，好的風格就是簡明扼要、得體和準確。<sup>89</sup> 它應當傳達出講話者或作者的激情，應當簡潔、清楚易懂。短句有助於理解。<sup>90</sup> 語言必須要引起聽話人的同情和接受。（這是《道德情操論》中最重要的概念）

因為交流是心理學問題，所以斯密堅持認為不同的論述需要不同的技巧。他詳細解釋了幾種：從需要客觀描述的**敘述性文章**，到要求解釋因果關係的**教授式論證**，到需要動之以情的**演說稿**。他的例證表明他極其熟悉經典作家和歷史學家。

然而，和人交流的關鍵是首先得了解他們。人天生

89 《修辭學和文學講座》第五講，第 53 卷，第 23 頁。

90 同上，第六講。

擅長同情，這使語言得以從最早最粗糙的交流嘗試發展到複雜並非常有益的社會習俗。

## 斯密關於政府和公共政策的論述

斯密的《法理學講稿》同樣也是僅存於其學生所記筆記。<sup>91</sup>按學生筆記，斯密用**法理學**這個字眼是指“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則的理論”<sup>92</sup>，或者“用於指導文官政府的規則”。<sup>93</sup>這裏同樣，這些講稿可以視為社會心理學的一次實際應用，一次追溯人類相互交際是如何使我們建立起法律和政府機構的嘗試。

開篇第一部分題目為**正義**，但涉及很多話題，包括政府的性質和演化、憲法、國內法、奴隸制、財產權、法庭和刑事正義。另外一個主要部分是講述**政策的**，包含斯密對價格、金錢、貿易和勞動分工等問題的思考，這些十年後決定了其《國富論》內容。

### 正義、政府和法律

斯密又一次沿用了進化的觀點。當狩獵和拾荒社會發展到遊牧時代，然後再到定居的農業時代和商業時

---

91 格拉斯版存有兩個版本，其一為 1762 到 1763 年學生所做的筆記，另外一個則是 1766 年所做筆記。

92 《法理學講稿》1766 年筆記第 398 頁。

93 同上，1762-63 年筆記，1762 年 12 月 24 日講稿。

代，就需要不同的政府和司法體制，以鞏固不同的經濟制度。（一個世紀後，卡爾·馬克思會同意：生產關係決定社會關係。<sup>94</sup>）

政府，正如斯密將會在《國富論》中詳細闡述的那樣，其建立是為了保護財產，因為財產在遊牧和農耕時代已經變得舉足輕重。這種制度最明顯的功用得到加強，斯密說，因為人的天性就是尊重權威。但正是市場經濟才導致了民主。以前，所有權力都出自當地酋長。在交換經濟中，生產商不得不轉而更多地關注無數普通平民，因為他們是顧客。結果，就播下了代議政府的種子。

### 勞動和交換

講稿中的其他章節也表明甚至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斯密就在醞釀《國富論》了。他說，“正是由於勞動分工才使國家財富增加。”這裏他也用了製針工廠的例子，<sup>95</sup> 以及生產羊毛大衣的例子，後者需要數以千計的人進行合作，從而給整個社會提供工作。我們被告知：“當你找酒商或者肉商買啤酒或牛肉時，你不會向他說明你是多麼需要這些東西。你只要向他說明，允許你按某一價格買這些東西對他有好處。你不是去訴諸其關愛之

---

94 Karl Marx,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ch. 2, Second Observation.

95 《法理學講稿》1762-3 年筆記，1763 年 3 月 29 日講稿第 341-2 頁。

心，而是利用其自利之心。”<sup>96</sup>（或許學生根本沒有領悟斯密原話中的詩意。）

類似地，我們發現斯密抨擊重商主義觀點，該觀點認為財富就是錢，並且一定要限制進口來保存財富。斯密指出，富人過窮奢極侈的生活，就會花掉資本，這有損生產和繁榮，儘管流通中一個子兒也沒有損失。因此，財富和錢顯然不是一回事。

講稿一方面是“國富論”的預演，另一方面也豐富了《道德情操論》中的經濟學思想。斯密堅持認為推動我們的物質財富增長的動力並不是人們的需求，而是我們的匱乏，他告訴我們“只有人才這麼奇妙，無論生產出甚麼產品，都無法讓他完全稱心如意。”<sup>97</sup>一旦我們吃飽、穿暖、有房住後，經濟發展也不會停住腳步。我們追求改善的腳步從不會停止。生產、科學和藝術進步也不會。

## 無能的政府

如果生產、交換和資本積累是通向物質增長之路，那麼有甚麼障礙呢？斯密說，經常是無能的政府。資本積累需要時間。如果人們認為政府不能保護自己免遭掠奪，無法讓他們自由貿易，那麼，人們就沒有多少動力勤奮工作和節省。

96 同上，1762-3年筆記，1763年3月29日講稿第348頁。

97 同上，1766年筆記第487頁。

《法理學講稿》從未打算出版，因此，斯密對政府無能以及政府干涉的抨擊更無拘無束，不像《國富論》那樣有所保留，但他還有很多同樣的批評靶子，包括合同法、土地使用權以及過時的長子繼承權的缺陷；給予生產商的政府補貼、壟斷地位以及特權；還有學徒時間長、人身依附以及阻礙人們換工作的其他規則。

重稅是另一個障礙。在講義中，他已經開始考慮稅收的效率問題，認為不應徵商品稅而應徵土地稅，因為土地稅更容易收。他認為，政府以及勢力強大的地主制定的中央計劃過多，而人們需要的是市場以及貿易自由，而不是來自上層的指導。

這種干預必然會減少公眾福利。人們自願交換是因為雙方都認為自己會從中受益。這是人類財富之源。他說，“兩人交易時，毫無疑問對雙方都有利。”他還告訴重商主義者說，“任何兩個國家之間的交易情況也完全一樣。”

## 自由和進步

他提出的對策同樣堅定有力：

基於以上考慮，英國完全應當打造成自由港；對外貿易不應進行任何形式的干預；如有可能用其他手段支付政府開支，那麼，所有課稅、海關稅以及消費

稅都應取消；應當允許與任何國家自由經營和自由交換任何商品。<sup>98</sup>

並且，同樣的道理，所有國家所有商品也都應當允許“自由交換”。

在斯密時代，有些學者假定發展是必然的。畢竟，他們所處的世界確實一直在發展。但是，斯密並沒有那麼樂觀。發展要求有規則體系，還有安全保障，還有自由以及正義等。否則，人們就沒有動力勤奮工作。毫無疑問，政府有義務維護以上條件，但也要避開創造財富的過程，並保證既得利益者不會被授權來扭曲市場。人們改善自己境況的自然願望一旦像這樣得到解放，就會成為推動發展進步的強勁動力。

## 結論

斯密不太著名的作品可能對現代讀者而言是個挑戰，只是因為其中所含學識的深度。在一本書中，斯密深入廣泛地談到了歷史上不同的宇宙模型；在另一本書中，他又在引經據典說明古代學者是如何使用語言的；在又一本書中，他在對比很多國家的法律制度，這些國

---

98 同上，1766年筆記第514頁。



家有的近，有的遠。

這些不僅說明斯密掌握很多學科，也表明他毫無疑問是研究人性的學者。他並不認為法律、政府、語言甚至科學僅僅是“司空見慣的”。其實，所有這些都是人腦的產物。當然這些是很複雜的系統，並不一定是我們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研究看不見的手的學者所着迷的正是我們個人的行動是如何共同打造出那些正常運轉的社會機制的。

## 第六章

# 關於“看不見的手”的題外話

---

亞當·斯密因為提出“看不見的手”這一概念而聞名，大多數人把它理解為我們自利的行為最終產生了整體社會效益。例如，我們拼命討價還價，結果就出現了高效分配資源的市場體制。

其實，除了在《天文學史》中提到一次“朱庇特的看不見的手”之外，斯密在所有著述中只用了這個片語兩次，而且意思也並非像人們通常假設的那樣。

---

## 富人為窮人提供工作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認為“上帝”之手會平均分配經濟報酬。富人並不比窮人吃得多。富人土地上生產的大部分食物的唯一用途是用來和他人交換——這些人為富人提供其所需要的奢侈品以及“小飾品”。雖然富人僅考慮自己的利益，但卻為數以千計的人提供了工作：

富人只是從大量商品中選擇最珍貴、最合宜的品種。他們消費得並不比窮人多。儘管他們天生自私、貪婪，儘管他們只是為了方便自己，儘管他們僱用數千人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虛榮而又貪得無厭的慾望，但是，他們卻與窮人分享了他們改善生

活所帶來的成果。<sup>1</sup>他們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引着，對生活必需品進行分配，結果和土地均分給所有人後的分配結果幾乎完全一樣。因此，儘管他們並沒有這種打算，也不知道這一結果，但是卻促進了社會利益，為人口增長提供了物質條件。

## 國內產業和國外產業

《國富論》只在其中的一個段落唯一一次提到過“看不見的手”，該段論述了促進國內產業而抑制外國產業的官方壟斷。斯密強調這會引導人們把更多的資本投入到國內產業上來，然後他自然而然地談到了問題的關鍵：

當每個人……盡最大努力利用自己的資本支持國內產業，並且同時對其進行引導，使其產出具有最大價值。所以，每個人都必然地努力使國家的收入盡可能最大化。一般而言，他的確不想促進公眾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做了多大貢獻。他之所以更願意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是外國產業，是因為他只想着自己的安全。而他引導產業使其產出可能具有最大價值，他一心所想的也是只是自己的收益。在這種情形下，和其他很

---

1 《道德情操論》第四卷第一章第 184-5 頁第 10 段。

多情形一樣，他被“看不見的手”指引着去推動他根本不會考慮的目標。<sup>2</sup>

在批評家看來，這兩個段落說明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真正的意思和現在流行的解讀相去甚遠。在一個段落中，私利帶來的好結果歸功於“上帝”。在另一個段落中，“看不見的手”只是討論出口貿易時的插話。

## 人類行為無意間導致的後果

其實，批評家們解讀得太狹隘了。通常人們所理解的“看不見的手”這一概念，貫穿斯密的著作，即使這兩段具體談論從未出現，也是如此。因為這一片語很方便簡潔地表達了斯密的觀點：人們的行為會產生並非本意的結果；並且如果像正義原則之類的基本規則得到遵守，那麼，個人自利的行為就會在無意間打造出一個運轉良好的社會制度，這對任何人都有利。

我買羊毛大衣時（用斯密的例子），<sup>3</sup>我是為了讓自己受益。我很少考慮店主的利益，至於參與做大衣的那些織工、牧羊人、剪羊毛的人、梳理羊毛的人、染色工、紡紗工、工具製造者、搬運工以及其他所有參與者，我

---

2 《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第 456 頁第 9 段。

3 同上，第一卷第一章第 22 頁第 11 段。

甚至很可能從沒見過，就更不會考慮他們的利益了。而他們參與製作大衣也並不是為了取悅我。他們想到更多的可能是掙錢養家。然而，我買大衣的確讓他們受益，因為我花的錢一分一分地自然而然地流入了他們每個人的腰包。同樣，他們每個人都投入勞動來製作大衣，就能讓我買到比自己製作來得更好更便宜的大衣。

不同國家的數以千計的人們進行勞動，不需要權威指導，僅靠每個參與者的自利驅動，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協調一致。這可能看來是個奇蹟。但是斯密的解釋卻很簡單。只有在雙方都預計會從交易中獲利時，人們才會自願進行交易。每個人都用自己不太想要的東西換回想要的東西，比如打工掙錢，或者花錢買東西。如果數以百萬計的人用這種方法與他人交易，那麼，這種好處就會廣泛而快速地擴散到全社會。

與此同時，價格表明人們願意做出多大的犧牲以換來特定的商品和服務。因此，價格向我們發出訊號：我們為了獲取最高收益應當把勞動和資本投入到甚麼領域。這樣，我們自然而然但卻無意間滿足了社會最重要的需求。

## 自我延續的制度

斯密看來對該社會制度的演化本質稍有了解。他說，該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行之有效。在《道德情

操論》中，他的確把這一點歸結到神或半神的上帝。那時，學術生活被教士統治，也許他沒有選擇。或許這在當時也是唯一的解釋，因為他比達爾文還要早一個世紀。然而，他在把這一制度歸於神還是人性問題上搖擺不定；後來，他在擺脫教會控制，並且收入也與教會無關後，他越來越傾向於這一見解，即這是一個自然而然自我延續的制度。<sup>4</sup>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反正看不見的手會保佑我們。斯密很清楚人可能會自私自利、羨慕、虛榮並記恨。如果過度的話，這些人性就是毀壞性的，儘管適度的話，這些是極其重要的。我們追求私利會促使我們交易，無意之中給他人帶來好處。我們羨慕富人，這會激勵我們更努力，從而恰巧會推動工業、科學甚至藝術的進步。因為我們喜歡被人尊敬，我們的虛榮心推動我們行善。因為其他人憎恨我們，會讓我們難受，所以我們會避免傷害他們。

因此，很奇怪，亞當·斯密的道德制度和經濟制度一樣都是以私利為中心的。我們在實現自己的理想時會捎帶惠及他人，而我們避免傷害他人是為了避免因他人的蔑視所帶來的痛苦。

---

4 這一觀點得益於蓋文·甘迺迪教授的啟發。

## 個人行為和社會後果

但是要使這一個社會制度順利而自然而然地運轉，我們必須遵循一些規則：正義規則，防止我們損害他人；道德準則，促使我們壓抑原始本能；在經濟領域，則是財產和合同準則。這些個人行為準則共同打造出有益的社會制度。我們可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我們的天性在任何情況下都比我們有限的理性和理解力能更好地指導我們。

最近，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F. A. 海耶克（F. A. Hayek）探究了和諧的社會制度可以不需要中央指令就能產生這一觀點，他一直追溯到斯密以及更早的學者。<sup>5</sup> 海耶克憑藉其對進化和心理學的現代解讀，闡明了人們只需遵循某些人類行為準則，社會羣體便如何能夠興旺發達，並在無意間打造出運轉良好的制度。<sup>6</sup> 比如，在語言領域，我們無意之間創造出了極其高效的交流系統，但卻只需遵循一些語法規則——這些規則人們遵循起來很自然，但卻很難解釋。當然，斯密在論述語言時講得

---

5 見 F. A. 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67, ch. 6, 'The results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 pp. 96-105. 簡明綜述可參見 E. Butler, *Hayek: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of Our Time*, Temple Smith, London, 1983, ch. 1, 'Understanding how society works'。

6 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ch. 4, 'Notes on the evolution of rules of conduct', pp. 66-81.



很接近這個意思。<sup>7</sup>

好的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於我們學會與人共處。我們都想滿足自己的慾望，但往往我們的慾望會與他人有衝突。慢慢地我們懂得甚麼行為會被別人容忍，並且不會導致毀滅性的暴力。因此，在與生俱來的人類同情心幫助下，我們制定出了正義規則，遵循這些規則，我們就可以在不損害別人利益的情況下追求自己的利益。<sup>8</sup>不僅在經濟領域，在其他社會交往中也一樣，我們學會合作共贏，儘管這完全不是我們的初衷。

---

7 見《修辭學和文學講座》。

8 《道德情操論》第二卷第二篇第三章。

第七章

斯密 名言選編

---

有關亞當·斯密更多引言參見《亞當斯密經典語錄集》

---

### 論勞動分工……

由於勞動分工，所有行業的產出大幅增長。在治理良好的社會，這就會使所有人都富裕起來，包括社會最底層的人。

《國富論》第一卷第一章 p.22, 第 10 段

### ……和相對優勢

通過建造玻璃房、溫牀和保溫牆，蘇格蘭可以種植上乘的葡萄，也可以釀造出上等的葡萄酒，但成本卻是從國外進口的至少同樣品質的佳釀的三十倍。僅僅為了鼓勵蘇格蘭生產波爾多和勃艮第那樣的紅酒就禁止進口所有外國葡萄酒，這樣的法律合理嗎？

《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 p.458, 第 15 段

每一個精明的一家之主都信奉的格言是：無論任何東西，如果自己做比買還要多花錢，那就千萬不要自己做……每個家庭這樣選擇都很精明，那麼，一個大國這樣做就不大可能很愚蠢。

《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 p.456-7, 第 11-12 段

### 論競爭……

一般而言，任何行業或勞動分工如果對公眾有利，那麼，競爭越自由越普遍，對公共就越有利。

《國富論》第二卷第二章 p.329, 第 106 段

消費是所有生產活動的唯一目的。只有在必須照顧生產者利益才能促進消費者利益時，才應該照顧。

《國富論》第四卷第八章 p.660, 第 49 段

### ……和扭曲貿易

同行的人只要聚會，哪怕是為了娛樂或消遣，他們交往的結果幾乎毫不例外：要麼是串通起來對付公眾，要麼是巧立名目來漲價……雖說法律不能阻止同行的人有時候在一起聚會，但是它不應為這種聚會提供任何便利，更不應當使之成為必須要做的事。

《國富論》第四卷第四章 p.145, 第 27 段

如果法律要求某個城鎮所有同行的人都在政府登記簿上登記姓名和住址，那麼，這就使同行聚會更便利……

如果法律使同行的人有權向自己人收費來救助他們當中的窮人、病人、寡婦和孤兒……那麼，這就使同行聚會成為必須要做的事。

同行的人組織成社團，不僅使聚會成為必須，而且也使得多數人的決議對全體同業人員都具有約束力。在自由的行業中，只有每個商販都一致同意才能成立有效的聯合體，而且，只要有一個人改變主意，這種聯合體就散了。社團中的大多數人可以制定行規，附有適當的處罰條款，這比任何自願組成的團體都更有效地限制了競爭，並且時間也更持久。

《國富論》第四卷第八章 p.145, 第 29-30 段

開拓市場，減少競爭，這總是對商人有利……在聽僱主階層提出的任何新的商業法律或規定時，人們都應當總是保持戒心。如果沒有長期仔細的審查絕不應通過。審查時不僅要非常細緻，而且要保持高度的懷疑。因為法律或規則是由這一階層提出的，而他們的利益從來就不會和大眾完全一致。並且，一般而言，他們有利益動機去欺騙甚至壓榨大眾，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還確實曾經欺騙和壓榨了大眾。

《國富論》第一卷第十一章 p.267, 第 10 段

## 論政府……

國王和大臣聲稱要監管平民厲行節約，這最為厚顏無恥和專橫……他們才是社會中最奢侈的人羣，而且毫無例外，總是如此。他們還是好好注意自己的開銷吧，平民的開銷可以放心地由平民自己管為好。如果他們自己的鋪張浪費不會毀掉國家的話，其臣民就更不會。

《國富論》第二卷第三章 p.346, 第 36 段

如果政治家想要指導人們應如何利用其資本，那麼，問題不僅僅是他多此一舉，而且，權力還被其攫取，而這一權力不僅不可能放心地託付給任何個人，也不可能放心地託付給任何委員會或議會。這種權力落到既愚蠢又無恥而竟然以為自己有資格發號施令的人手裏，那是最危險不過的了。

《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 p.456, 第 10 段

……稅收……

一個政府向另外一個政府學習經驗時，學得最快的就是如何從人們口袋裏搜刮錢財的經驗。

《國富論》第五卷第二章第二小節 p.861, 第 12 段

每個國家的國民都應當出錢供養政府，數額應當儘量根據各自的能力按比例繳納……

《國富論》第五卷第二章第二小節 p.825, 第 3 段

每個人必須繳納的稅額應當是確定的，而不是隨意的。不論是對納稅人，還是對其他任何人，繳稅的時間、方式和應繳的數額都應當清楚明白……

《國富論》第五卷第二章第二小節 p.825, 第 4 段

每一種稅徵收的時間或者方式都應當盡可能方便納稅人繳納。

《國富論》第五卷第二章第二小節 p.826, 第 5 段

每一種稅的設計，除了流入國庫的錢，都應當盡可能少從人們的口袋裏掏錢，並盡可能少阻擋人們掙錢……

《國富論》第五卷第二章第二小節 p.826, 第 6 段

資本的擁有者可以說是世界公民，並不是必然依附於某一國家。如果他所在的國家為了弄清他要交的沉重稅金，對他進行調查，使他不勝其煩，那麼，他往往會離開

這個國家，並把資本轉移到其他國家。在新的國家，他可以更自在地重操舊業，或者享受自己的財富。

《國富論》第五卷第二章第二小節 p.848-9, 第 f8 段

……以及補貼

發給白鯡魚漁業的獎勵金是一種噸位獎勵金。它是按照漁船的載重量發放，而不是按其捕魚的努力程度或業績發放。因此，我想，人們裝備船隻的唯一目的就是撈獎勵金，而不是撈魚。這已經是見怪不怪了。

《國富論》第四卷第五章 p.520, 第 32 段

論進口限制措施

正如一個富人對住在附近的勤勞的人來說可能比窮人更願意花錢買東西，富有的國家也同樣是個好顧客。（貿易限制措施）期望使我們所有的鄰國都陷入貧困，往往會把對外貿易弄得無足輕重，為人所不齒。

《國富論》第四卷第三章第二節 p.495, 第 c11 段

要判斷這樣的報復性措施（針對其他高關稅國家徵收的關稅）能否達到這一效果，與其說需要立法者的學識，倒不如說需要那種陰險狡詐的動物——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政治家或政客——的手腕。因為前者考慮問題應當是有原則性的，並且這些原則總是一樣的；而後者考慮問題則是根據隨時發展變動的事態情況。

《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 p.468, 第 39 段

## 論激勵措施……

公職人員的報酬只能在提供公共服務後才發放，並且應按服務時的勤勉程度發放，只有這樣，公共服務才能做得最好。

《國富論》第五卷第一章第二小節，p.719, 第 b20 段

## ……以及不當的激勵措施

每個人都想盡可能過得舒適安逸；對某項費力的差事，如果他做或不做報酬都完全一樣的話，那麼，很顯然，他要麼完全不理會，要麼隨便馬虎地敷衍了事，這對他最有利。

《國富論》第五卷第一章第三小節，p.760, 第 f7 段

## 論正義……

如果失去了（正義），那麼，人類社會這個宏偉的大廈……必然會在頃刻間土崩瓦解。

《道德情操論》第二卷第二篇第三章 p. 760, 第 4 段

要把一個國家從最原始的野蠻狀態建設成最富裕的國家，除了和平、低稅以及還說得過去的司法機關外，幾乎沒有其他甚麼必要條件了，因為其他所有條件都會自然而然出現。

1755 年講稿，引自《亞當·斯密的生平和寫作》

第四部分 p.25



……以及人的同情心

不論假定人多麼自私，顯然，人性中存在某些準則使其關注他人的命運，並使其認識到他人的幸福對自己而言不可或缺，儘管他這樣做除了見證別人的幸福而感到快樂外一無所獲。

《道德情操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 p.9, 第 1 段

論改善的動力……

每個人都會自然而然地為了改善自己的境況而努力……這種力量非常強大，單憑自身，不靠任何幫助，不僅能使社會走向繁榮昌盛，而且還能克服很多不合理的障礙——人們制定的愚蠢的法律常常掣肘。

《國富論》第四卷第五章，關於玉米貿易的題外話，  
p.540, 第 b43 段

……看不見的手……

（富人）消費得並不比窮人多。儘管他們天生自私、貪婪，……但是，他們卻與窮人分享了他們改善生活所帶來的成果。他們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着對生活必需品進行分配，結果和土地平均分配給所有人的情況下人們所得的必需品幾乎完全一樣。因此，雖然他們沒有這樣打算，也不知道，但卻增進了社會利益，並為增長的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

《道德情操論》第四卷第一章 p.184-5，第 10 段

每個人……既不打算促進公眾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做了多大貢獻……他只考慮自己的安全；而他引導產業使其產出可能具有最大價值，他一心所想的也是只是自己的收益。在這種情形下，和其他很多情形一樣，他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引着去推動他根本不會考慮的目標。

《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 p.456, 第 9 段

我們有飯吃，靠的並不是肉商、酒商或麵包師的仁慈，而是靠他們對自己利益的關心。我們倚重的是他們的自利心態，而不是他們的人道精神。只要向他們買生活必需品，我們就會講到他們從中得到的利益。

《國富論》第一卷第二章 p.26-27, 第 12 段

### ……計劃

體制內掌權的人……往往很自負地以為自己很聰明；對自己提出的所謂完美的政府方案常常迷戀不已，以至於不能容忍對其任何部分進行哪怕是最小的改變……他似乎設想自己可以輕鬆自如地對一個龐大社會中的不同成員作出安排，就像用手移動棋盤上的棋子那樣。他沒有考慮，在人類社會這個大棋盤上，每一隻棋子都有其行動規則，並與立法機構可能想要強加給他的全然不同。

《道德情操論》第四卷第二篇第二章 p.233-4, 第 17 段

### 論大學

在牛津大學，大部分大學教授這些年來完全放棄了教

書，甚至連裝裝樣子教書都懶得去做。

《國富論》第五卷第一章第三小節第二部分 p. 761, 第 8 段

一般而言，學院和大學設計紀律，並不是為了使學生受益，而是為了教師的利益，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為了使教師舒適安逸。

《國富論》第五卷第一章第三小節第二部分 p. 764, 第 15 段

### 論財富分配……

如果能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境況，那麼，就絕不能認為會累及全體人。而如果社會中絕大多數成員都過着貧困悲慘的生活，那麼，任何社會都不可能繁榮幸福。

《國富論》第一卷第八章 p. 96, 第 36 段

然而，人們最常抱怨的，莫過於缺錢了。

《國富論》第四卷第一章 p. 437, 第 16 段

### ……自由帶來的好處

（如果沒有貿易限制措施）簡單明瞭的天賦自由制度就會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每個人……都可以聽任其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利益……有一種責任，君主完全不用擔負，其實世上沒有任何人足夠聰明博學能擔當此任。這個責任就是監管個人的產業，並指導其用到對社會最有利的地方去。

《國富論》第四卷第九章 p. 687, 第 51 段

延伸閱讀

### 格拉斯哥版亞當·斯密著作和通信集

1. Bryce, J. C. (ed.) (1985),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 Lettres*,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2. Campbell, R. H., and A. S. Skinner (eds) (1982),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3. Haakonssen, K., and A. S. Skinner (2003), *Index to the Works of Adam Smith*,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4. Meek, R. I., D. D. Raphael and P. G. Stein (eds) (1982),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5. Mossner, E. C., and I. S. Ross (eds) (1987),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revised edn,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6. Raphael, D. D., and A. L. Macfie (eds) (1984),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7. Wightman, W. P. D., and J. C. Bryce (eds) (1982),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this volume includes Dugald Stewart's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 LLD').

### 其他版本的斯密著作

1. Haggarty, J. (1976), *The Wisdom of Adam Smith*,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collection of key quotations from Smith's works).
2. Heilbroner, R. L., with L. J. Malone (1986), *The Essential Adam 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bridged version of Smith's main writing, with introductory notes).

### 關於斯密及其著作的書

1. Buchan, J. (2006), *Adam Smith and the Pursuit of Perfect Liberty*, London: Profile Books (arguing that Smith's ideas do not fit within

modern political categories).

2. Campbell, R. H., and A. S. Skinner (1982), *Adam Smith*, London: Croome Helm (biography with clear summaries of Smith's main works).
3. Fry, M. (ed.) (1992), *Adam Smith's Legacy*, London: Routledge (Smith's place in modern economics, as seen by Paul Samuelson, Franco Modigliani, James Buchanan and other prominent economists).
4. Kennedy, G. (2005), *Adam Smith's Lost Legac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focusing on Smith's moral philosophy, Kennedy argues that Smith is often misinterpreted today).
5. McLean, I. (2006), *Adam Smith: Radical and Egalitaria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the title says it all).
6. O'Rourke, P. J. (2006), *On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witty but perceptive summary of Smith's main ideas).
7. Rae, J. (1895), *Life of Adam Smith*, London: Macmillan (engaging biography, also reprinted in 1965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cob Viner).
8. Ross, I. S. (1995), *The Life of Adam 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ull-scale biography by a leading Smith scholar).
9. West, E. G. (1976), *Adam Smith: The Man and His Works*,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excellent overview of Smith's life and contribution).

### 關於斯密及其著作的文章

1. Rosten, L. (1970), 'A modest man named Smith', in *People I Have Loved, Known, or Admired*, New York: McGraw-Hill.
2. Sprague, E. (1967), 'Adam Smith', in P. Edwards (ed.),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London and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 (straightforward and concise exposition, concentrating on Smith's moral philosophy).

## DVD

1. *Adam Smith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 評論：亞當·斯密的現實意義

克雷格·史密斯 (Craig Smith)<sup>1</sup>

對大多數人而言，特別是在其家鄉蘇格蘭，亞當·斯密是個名人。愛丁堡正在為他豎立雕像，鈔票上印有他的肖像，一所大學和劇院都以他的名字命名。甚至我寫這個評論所在的辦公室也是在哥拉斯哥大學的亞當·斯密大樓。然而，遺憾的是，儘管人們知道他並紀念他，但卻沒有多少人了解並紀念他的真實思想。斯密是蘇格蘭，也是英國，乃至整個歐洲誕生的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希望這本介紹亞當·斯密的小書對大家了解他的思想有所幫助。

我第一次接觸到亞當·斯密還是通過中學的經濟學啟蒙老師，他當時引用了《國富論》中的例子來活躍課堂氣氛。在某個星期三的第四節課他講到了製針工人、工人的羊毛大衣，還有肉商、酒商和麵包師等，我聽得津津有味。我很幸運，很早就以這種方式接觸到了這位偉人的著作，更幸運的是，在讀學士學位時能夠選修蘇格蘭啟蒙運動這門課。

遺憾的是，我早期接觸過亞當·斯密的思想，儘管很

---

1 克雷格·史密斯撰寫該文時是格拉斯哥大學政治系的英國科學院博士後研究員，到出版時他將在聖安德魯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道德哲學系任講師。



喜歡，但機會卻很少。現在，學者和非專業人士讀過斯密著作的人也不多。我們的中學和大學應該多講授斯密的思想，但卻講得不夠。這太遺憾了。尤其遺憾的是，大學也只是粗略地向經濟學本科生介紹斯密這位經濟學之父。很多經濟學課程只是在介紹勞動分工的講座中簡單地提一下斯密（一般是製針這個例子），然後就討論斯密用精煉抽象的術語總結的原理。

這確實很遺憾，因為斯密寫作風格清楚明瞭，現在也像 250 年前一樣很好懂。他的著述中的評論豐富多彩，引人思考，給人啟迪。他的著述表明他試圖弄清紛繁複雜的社會到底是如何運行的。

在全球化的當今世界，斯密對國際和國內貿易的研究直接觸及到影響我們生活的各種因素的核心。他寫作年代或許與我們不同，但是，他對重商主義錯誤的分析判斷，他對政治隨意干預經濟的不信任，在當今這個世界依然特別有現實意義，因為商業貿易常常被那些反對貿易有利的人所妖魔化。

斯密在知識界不乏反對者。他們把斯密當作自私的宣導者而拋棄，但是，任何人只要讀過並真正理解其著作，就會意識到這其實並不是真正的斯密。《道德情操論》就是一部關於道德心理學的著作，非常人性化，它把同情置於人類體驗的中心位置，這不無道理。斯密成年後一直致力於研究和解釋人的日常經歷。他並沒有癡迷於可望而不可

即的至善至美。相反，他把時間花在研究普通人是如何與他人進行社會交往的，以及他們又是如何做出道德判斷的。

《國富論》中對貿易的研究和《道德情操論》中對同情的分析也並沒有像有些膚淺的評論者指出的那樣自相矛盾。兩者都是人類生活的不同方面，斯密在探究兩者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時，其在使用概念方面同樣嚴謹。

斯密著作的基礎是想要理解人類社會生活的活生生的現實情況。例如，他反對政治過度干預經濟的論證就是建立在對商業交易實際情況的事實分析之上。還有一點常常為人們所忽視，他在舉例說明個體之間的交換會帶來生產效益時，所用的例子都不是富人——他常常很鄙視他們——而是窮人。斯密認為貿易會使人人受益，特別是社會最底層羣眾。

亞當·斯密的著作清楚地分析了維護自由社會所必須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法治和正義構成了天賦自由這一“簡單明瞭”的制度的框架，並使全人類受益。另一方面，人們共同持有的道德習俗也與時俱進，支撐和維繫着人類的羣體生活。

斯密留給現代世界的主要遺產正是“看不見的手”這一思想，這一點更概括地講就是：社會演化是人們無意間造成的結果。人類取得的很多最重要成就，正如斯密的朋友亞當·福格森（Adam Ferguson）所說的那樣，都是人類行動的結果，而不是人類設計的結果。認識到這一點對我們

所有人而言都是具有深刻意義的一課。正是這句話使斯密對“當權者”持高度懷疑的態度，因為他們想要把人們組織起來實現崇高目標。

斯密很務實、謹慎，因此，他的思想對傲慢自大的政治理論家而言往往不太合適。當然，這並不是說斯密不應被視為激進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在他所處的時代就是顛覆性的。在我們這個時代，他的思想中所表現出的政治觀點，用博愛和自由主義來形容最為貼切。但其思想依然很激進，因為它對政治學課上很多公認的假設提出質疑。或許如果我們更多的政治家看過並弄懂斯密的著作，那麼，他那些看起來激進的思想就會被認為其實就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常識性建議。

毫無疑問，在學術界，對亞當·斯密的研究很熱鬧。2000 到 2004 年間，全世界超過 14 位研究生致力於亞當·斯密研究並獲得了博士學位。他們加入到亞當·斯密研究者的國際學術圈中，從事各學科的研究。國際亞當·斯密協會每年出版一期亞當·斯密評論，這進一步說明人們對斯密著述的學術興趣非常濃厚。

除了斯密研究者外，還有很多學者受到斯密啟發。斯密的言論為很多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拓展空間。人們對斯密“相當現代的”科學理論的興趣與日俱增，其道徳社會心理學也在鼓勵人們研究進化心理學這一新興的分支學科。斯密提出的語言學理論和審美學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從而為學者提供了更為理想的研究領域。正如巴特勒博士在斯密簡介一書中有力地表明的那樣，斯密留下了廣泛的學術遺產，但同時也是未競的遺產。探究斯密的思想內涵為人們提供了豐富而激動人心的終生研究項目。

亞當·斯密為我們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文獻遺產。他是幫助改變我們現在所生活的世界的人。他也是為我們提供理解這個世界的學術工具箱的人。因此，更多的人應當看他的著作，並理解得更透徹。果真如此，那麼其思想的啟迪作用將會幫助啟迪我們自己生活的世界，正如他的深刻見解曾經啟迪他那個時代一樣。



“每個人…既不打算促進公眾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做了多大貢獻…他只考慮自己的安全；而他引導產業使其產出可能的最大價值，他一心所想的也只是自己的收益。在這種情形下，和其他很多情形一樣，他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引着去推動他根本不會考慮的目標。”

《國富論》

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名字如雷貫耳，但他對經濟學、政治學和哲學的貢獻仍不為大多數人所熟知。本書扼要精闢的介紹了這位“經濟學奠基人”的生平和作品。其中不僅涉及《國富論》中關於貿易和勞動分工的洞見，也論及他的其他作品，比如《道德情操論》、關於科學史的著述以及課堂講稿中的真知灼見，為世人全面了解其思想成就提供了一條捷徑。

本書重點討論：

- “看不見的手”如何指引市場走向秩序
- 為何商業監管的效果適得其反
- 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和未來收入取決於什麼
- 如何建立道德高尚的社會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陳列類別：

社會科學·經濟學

HK\$ 72.00



ISBN 978 962 07 6538 4



9 789620 765384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